

鹿寨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鹿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委会

《鹿寨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郑一鸣

副主任：饶冬生

覃清培

编 委：周天智

刘克林

刘江平

黎耘（特邀）

《鹿寨文史资料·第12辑》

内容简介

201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0周年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政协鹿寨县委员会赶在党的生日7月1日前，出版《鹿寨文史资料·第12辑》，作为庆祝党的生日礼物。

本辑特别开设了《难忘盛会》栏目，收集了《我经历的开国大典》和《见到了毛主席》这两篇作者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了毛主席的文章。《一段鲜为人知的鹿寨县中共党史》一文，展现了一段时间不长，鲜为人知的鹿寨县中共党史。

根据收集到的稿件，另外还开设了《烽火岁月》、《剿匪纪实》、《岁月留痕》、《群文新篇》、《古迹觅踪》、《民俗风情》、《民族宗教》、《人物画廊》等栏目。

目 录

2011 年·总第十二辑

◇难忘盛会◇

- 我经历的开国大典·····郑 修
见到毛主席·····廖茂乾

◇烽火岁月◇

- 逃难漫记·····沈光明
鬼子进村·····廖茂乾
被日寇击落的两架“飞虎队”战斗机·····谢汉卿
寨南村的红色历史篇章·····覃德礼

◇剿匪纪实◇

- 突出重围·····吴 狄
刻骨铭心鱼水情·····吴 狄
导江剿匪散记·····杨 骥
鹿寨县农会给剿匪庆功会的贺信·····韦在绪/供稿
一段鲜为人知的鹿寨县中共党史·····吴 狄

◇岁月留痕◇

- 屯秋铁矿是这样发现的·····杨胜德 蒋向阳
鹿寨县首次飞机播种造林·····廖学敏

鹿寨县电影事业的辉煌时期·····	韦仕
大旱之年 生产自救·····	黄诗美
鹿寨县国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变化·····	杨骥 韦健祺
误收横茛作茛茛·····	韦健祺
教“老学”的六平村私塾·····	李宝璜
垦荒移民·····	杨骥

◇群文新篇◇

鹿寨县首届“三月三”民歌节追忆·····	李锦华
历时 41 天的鹿寨县首届戏曲表演大赛 ·····	李宝璜

◇古迹觅踪◇

里定古驿道·····	朱芳信 朱明惠等
中渡城隍庙·····	黄小斌
寨沙镇柳能屯清代拔贡牌匾及对联·····	刘江平

◇民俗风情◇

鹿寨甘王庙及庙会·····	朱芳信 朱明惠等
---------------	----------

◇民族宗教◇

鹿寨清真寺的变迁·····	海逢友
---------------	-----

◇人物画廊◇

林芳同志的一生……………林桄华

父亲潘文经向张书旂先生学画的经历……………潘允剑

周公谋与他的儿子们……………沈光明

我经历的开国大典

●郑 修

1949年春，我在北京“东北军大”学习。当时为了“南下”，我校接上级指示于9月底提前结业。时值巧逢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幸运地参加了这次盛会——开国典礼。

会址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各团体上午8时半开始入场，下午3时前入场完结。我校在安定门外皇寺大楼，我们上午7时许就向广场出发了。当日晴空万里，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真是风和日丽。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锣鼓喧天，身穿各色各样盛装的群众队伍比比皆是，一派喜气洋溢的节日气氛令人兴奋极了。

我校队列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脚金水桥前第一线，楼上主席台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城楼布置得隆重而庄严，八盏大红宫灯亮堂堂的吊在主席台正中，楼阁两边成排的彩旗迎风招展。广场大道上站着的“标兵”，在间隔一致的位置上威严挺立，个个好似铜墙铁壁铸造的“金刚”。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列席在主席台上，等候着时辰的到来。

下午3时正，大会开始了。首先是毛泽东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接着就鸣炮。这炮，是真正的几十门野战炮在向景山警戒区连续发射实弹。轰隆隆惊天动地的炮声，伴随着毛主席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宣告声合在一起，响彻云霄，震撼大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怎能不让人自豪和骄傲啊！，数以万计的彩色气球腾空而起，飘得漫天都是。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实在无法形容，全场都在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共和国万岁！”，呼声如潮，此起彼伏。

成千响炮声过后，大喇叭发出“毛主席升旗”的喊声，我们的队列指挥给我们即刻来个“向后——转”。转过身来，面向广场，我抬眼一看：啊！广场上的人群啊，真个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边（据说有50余万人参加）。成万面彩旗如同五光十色的繁星，点缀在人群之中，看去使人眼花缭乱。我遥望广场中心矗立的旗杆，离我们有数百米，我不时回过头去，看着还在台上的毛主席，心想：等到主席走下城楼，再乘车到旗杆处，起码还得等20分钟。谁知，毛主席稳步走向台前右侧的大红柱边，将巨手轻轻一按电钮，广场中央的那面五星大红旗就冉冉地升起来了。这面国旗特别大，特别红，在上万面彩旗中它显得像“旗王”。全场几十万人都同时举手向它敬礼。这是毛主席新手升起来的第一面国旗呀！回想过去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嚣张气焰，回想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不由人百感交集，感叹万分。这国旗来之不易呀！它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大转折的标志，是我国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象征哪！我衷心地祝祷：五星红旗呀，高高地飘扬吧，永远地飘扬吧！

升旗过后，接着是朱德总司令检阅海、陆、空三军。（我们当时还是学员，虽穿军装但不属受阅对象。）真巧合，这时我空军的机群，3架一组，呈“品”字形出现在上空，轰隆隆、轰隆隆绕广场一周，撒下了无数五颜六色的传单。全场又一次沸腾起来。同学们从没见过朱总司令，心情非常高兴，当朱总司令的敞篷汽车徐徐开到我们队列前的时

候，个个欣喜若狂，有的竟不由自主地在队列里蹦跳起来，把队列都搞乱了。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朱总司令还向我们招手、点头微笑呢！

阅兵式完毕，最后是海、陆、空三军进行分列式通过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步调一致、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一群群大方块队绵延数千米，步兵群、骑兵群、机械化部队、海、空陆战队战车、装甲车群、山炮、野战炮群，都各有特色。每个方块队都如一群群势不可挡的下山猛虎，真是威风十足，展示了我军的强大实力。从“小米加步枪”走到今天，怎不令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心情老沉浸在欢乐之中。“开国典礼”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荣幸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成为我一生中最忘却不了的一件大事；它曾激励着我奋勇“南下”，促使我在征途中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光阴似箭，这一盛会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我仍记忆犹新。每当回忆这一往事，总感到还有一股暖流在全身荡漾着。现在，我国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建设事业在突飞猛进，蓬勃发展，处处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各族人民正朝着为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中国，已成为闪闪发光的东方明珠，引起世界各国刮目相看。祖国呀，炎黄子孙都为你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啊！

见到了毛主席

●廖茂乾

1966年9月，“四清”运动已进入组织建设阶段，县“四清”总团办公室通知我回县，把全面工作交给四排分团副书记张学高同志和政治部主任穗奇同志，回来时行李一起带回，不再去四排了。我以为是工作有变动，直到见了县“四清”工作团于子明书记，我才知道：组织上让我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六周年观礼，和我一起同去的还有思贤大队的农民代表卢木英，23日到南宁饭店报到。

“北京？上北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地问于书记。于书记告诉我：“自治区组织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你任副团长。具体事情，到时会有安排。”能上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事我做梦也没有想过，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同时也感到任务的繁重和光荣。

到了南宁饭店，我就和卢木英分开了——她是工农兵代表，属区党委组织；我是少数民族代表，属自治区民委组织，当晚到区民委集中。

24日清晨，我和代表们来到区民委会议室等候领导的接见。8时许，自治区民委主任覃雁和自治区纪委委员王锋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覃雁同志说：“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区党委决定：组织广西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到首都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庆祝活动，由各地、市派来40多位少数民族代表组成广西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团长由王锋同志担任，副团长由鹿寨县副县长廖茂乾和那坡县法院副院长卢权同志担任。秘书是潘美兰和小吴同志，具体事务由他们两位同志办理。同志们是代表全区1600多万少数民族去的，是代表们的光荣，也是全区少数民族的光荣。大家是带着各少数民

族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深情厚谊去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王锋同志也讲了话，他要求大家在南宁也好，在北京也好，都要互相关照，不要掉队……接着，两位秘书抬来了三箱民族服装，要大家试穿，说是到北京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广西的代表。柳州地区和柳州市编为一个小组，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而壮族多数穿上唐装；柳州市的工人代表穿的是工作服。

26日上午，代表们在南宁机场乘飞机上京，民委机关干部到机场送行。4时许，到达首都机场，然后乘汽车驶往民族饭店。入住豪华的民族饭店，我们代表团中多数人来到边远山区，看到走廊、房间都铺着地毯，刚开始都不敢下脚，乘电梯还以为是过磅秤呢！

第二天，王锋同志召集全体代表，传达了国庆观礼日程安排和注意事项。他说：“明天（28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将接见来京观礼的各代表团全体同志；晚上赛福鼎副委员长招待各少数民族代表团全体代表；还要选出两位代表出席周总理举行的国宴。30号晚上，全体代表要到中南海去住……”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王锋同志接着说：“大家参加宴会时，恐怕都不大好意思吃。散席的时候，可以把桌上剩下的糕点水果带走，回到宿舍再吃。”这一说，大家都笑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提议：由王锋和卢权两位同志出席周总理举行的国宴。临散会时，王锋同志强调：现在，北京到处都张贴有大字报，大家可以看，但不要议论。

26日早餐之后，各省区的少数民族代表团约500多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由民族饭店后门出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集会地点，等候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会场里早已坐满了人，各省的代表正在“拉歌”。由于少数民族服装特别显眼，不知从什么位置传来了呼喊声：“新疆代表来一个！”新疆的代表立刻响应，围了个小圈，跳起了新疆舞，唱起了《我们新疆好地方》、《敬爱的毛主席》。会场里掌声四起，一片欢腾。

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准备开会的时候，全场肃静，只见周总理、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了主席台，代表们全体起立，大家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周总理挥手向大家致意，说：“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年啦！这十六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请大家到首都来共同庆祝这光辉的节日。你们是工农兵的代表、学生红卫兵的代表、还有各少数民族的代表，是毛主席的客人！毛主席将接见你们！”顿时，掌声如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周总理接着说：“大家热爱毛主席，关心毛主席，就要关心毛主席的健康，这是全党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毛主席接见时，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同毛主席握手，不准给毛主席赠送礼物，不准给毛主席戴红袖章，就地站立不要动。这就是热爱毛主席……”讲话之后，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分别与各代表团照相合影。

下午4时许，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先看了几个省厅后，就来到了广西厅活动。不久，就进了宴会厅，参加赛福鼎副委员长举行的招待会。6点整，赛福鼎副委员长和贺龙元帅步入宴会厅，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赛福鼎副委员长用维吾尔族语致词，一位工作人员用普通话作了翻译。致词之后，贺龙同志举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干杯！”半小时之后，赛福鼎和贺龙同志首先退席。整个宴会进行了一个小时，代表们回到宿舍，各人漫谈着当天的感受，一面品尝从宴会带回的剩余食品，都很兴奋。

29日，我们全天学习讨论总理的讲话和入住中南海的具体事项：如何热爱毛主席，关心毛主席的身体健康，遵守各项纪律，保证不带硬刀具之类的东西，住进中南海前要把这些东西交由秘书统一管理。30日下午，各代表团列队仍从民族饭店后门步行去中南海。原来内蒙古、西藏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男代表习惯带着的刀具不见了，腰间空荡荡的，只扎着腰带。

少数民族代表安排在国务院秘书厅临时腾出来的办公室，睡的是地面铺着一层厚厚的高粱杆的大地铺，每人一张席子、一床被子和床垫、一只枕头。这里的房子都很陈旧、朴实，但很洁净，多是平房和两层楼房。代表们先集中在一个小礼堂开会，秘书厅的负责同志致欢迎词和介绍这里的情况。虽然这里的条件比较简陋，也不像饭店、宾馆安排有服务员，但大家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用餐时，十个人围绕着一大盆羊肉焖豆芽，就地蹲着吃，吃得很香甜。是啊，来到中南海，来到毛主席身边，吃餐饭住一宿，大家都感到很温暖，很幸福！

这天夜里，许多代表彻夜难眠，思绪万千：是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使全中国劳苦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翻了身，才有今天的幸福、今天的光荣……大家都盼望天快点亮，好去见毛主席。东边天刚刚发白，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起来洗漱，收拾东西，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吃过早餐，各代表团立即列队，工作人员给每位代表发一份中餐，食品袋子里装有两块大面包、两片火腿肠、两个梨子。队伍步行来到天安门城楼后面的中山公园，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和学生红卫兵代表是最后一批上天安门城楼的，所以在那里又等候了很久。红卫兵代表坐满了公园的小礼堂，我出于好奇，也走进去在一旁看个究竟。不多时，只见周总理快步登上主席台，工作人员把话筒放在他的面前。周总理说：“同学们，小将们，大家很快就能见到毛主席了！大家一定要牢记和遵守纪律，一定要关心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红卫兵已经“串联”，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时刻挂在总理心上。总理在繁忙之中，还要来红卫兵作动员……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到了！红卫兵代表是从东楼梯上的，少数民族代表是从西楼梯上的。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西楼靠内侧的地方，开始还秩序井然，后来大家都想去看看下边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形，队伍就有些乱了。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叫喊：“大家快快站好！——毛主席来了！”大家赶紧回归原位，还来不及整理好队伍，毛主席已从城楼走道来到了代表们中间。代表们立刻狂欢起来，一个劲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在欢呼声中，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绕了两圈，然后慢慢离去。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光荣和幸福的时刻，我永远难忘。我的目光片刻也不离开毛主席身上，根本顾不上看其他人。后来我问莫自林：怎么没见林彪呢？莫自林说，林彪在毛主席后面，矮矮的，拿本毛主席语录，摇着手。毛主席走后，周总理来到代表们中间，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挥手；接着，身着军装的江青挥动毛主席语录，走到代表们中间，大家又是一阵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也举着手和大家一起呼喊……

我们在城楼上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上壮观的庆祝活动。几十万人的队伍站立在广场上，手持各种颜色的花束和彩带，一个个方块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致敬，里面出现壮观美丽的图案，里面呈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字样。旗如海，人如潮，欢呼声震天动地，代表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晚饭后，我们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看焰火晚会。少数民族代表被安排在金水桥附近。因为穿的是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本身就像是演出队伍。特别是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的代表，一定位就跳起了民族舞蹈，唱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歌曲，格外引人注目。焰火在夜空中绽放，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天安门广场，金水桥特别光亮。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走到群众中间，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度国庆之夜。

“十·一”之后，各少数民族代表团分别单独活动。广西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故宫、

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八达岭长城、石景山钢铁公司。在北京活动之后，王锋同志是保定人，顺便回家探亲了，由我和卢权同志带队到山西省大寨参观，后来又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直到11月初才乘火车回到南宁。在南宁又停留了两天，参观了西津水电站和进行总结。我随广西少数民族代表团历时40余天，完成了一生难忘的旅程。

◆烽火岁月◆

逃难漫记

——日军入侵雒容回忆录

●沈光明

1944年秋，广西省城桂林被日军攻陷，守城之国军将领阚维雍（柳州人）师长殉国。之后，日军在桂林兵分两路，沿湘桂铁路、桂柳公路南下，于11月上旬进入鹿寨、雒容，并分兵在鹿寨、俄洲、雒容驻扎。自此至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为止，雒容民众饱受了被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之荼毒和逃难四野餐风宿雨之苦。《逃难漫记》所记录的，乃我当年亲历亲见亲闻之回忆。

逃难水晶

在日军尚未进入雒容之前，雒容铁桥已被国军炸毁。被柳州行署尹承纲任命为雒容战时县长的何次山（注：何次山，雒容人，解放后被逃台之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任命为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司令，与人民为敌。1951年在四十八弄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已将雒容县府迁往导江。雒容城里城外及铁路、公路两厢村庄之民众开始“坚壁清野”，四处疏散。我和祖父及三哥全文，也由民生街之商铺回到乡下老家。

我的老家在城厢乡（即今之雒容镇）新木良村，离雒容县城12华里，距铁路、公路8华里，在兵燹之灾中并非安全地带。因此，当日本鬼子进入雒容之时，我父亲便领着一家人，逃到比较偏僻的象县（即今之象州县）水晶。我们在水晶住了还不到一个月，林秀山（注：林秀山，雒容二兴村人，惯匪首。解放后被逃往台湾的白崇禧任命为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126军军长。1951年在金秀县境内被我剿匪部队擒获，同年在柳州广场公审枪决）便领着他的“自卫队”到水晶驻扎，并大开赌场，大刮赌捐，敲诈富户。民国年间之军阀混战时期，我父亲在旧桂系军阀沈鸿英身边供职，林秀山乃其属下之弁兵，对林秀山之为人知之甚详：狡猾、奸诈、贪婪、心狠手辣。因此，林秀山到了水晶后，我父亲生怕被他乘国难之机，无端嫁祸，借势勒索，便有了离开水晶之意。正好此时，我德哥也从家里来到水晶。父亲问他：“家乡情况如何？”德哥说：“虽然雒容、俄洲都驻扎着日本鬼，但目前家乡一带还算平静。”父亲听了这话，便决定避开林秀山，离开水晶这是非之地，返回家乡。

避难马山

由水晶返乡之后，为了一家人的安全，我父亲还是不敢让我们回家，而是把我们安顿在离家七八里地的一个叫下矮崖的小山村里。这个小山村背靠马山，离马山不到一里。

马山，山岭连绵，横跨约 30 多华里，纵深 10 多华里，人迹罕到，是躲避兵燹之灾较为安全的山区。当时铁路、公路两旁的村子，如对亭、俄滩、瞭望、马步、甫口、新村、大塘等村子的民众，大多把家小安顿在山上。

我们在下矮崖村大约住了八九天，就有 10 多个驻扎在俄洲村看守铁桥的鬼子由甫口村向上矮崖村开来，企图到这里打掳。当时在上矮崖村避难的大塘村村长胡光元得到“哨报”（当年为了防备鬼子突然袭击，凡有人居之村子均派人在村边之最高点放哨），立刻集结了大塘村的十几条枪，在上矮崖村头之隘口，对日本鬼子进行阻击。枪声骤响，鬼子蒙头转向，顿时不知所措。也许是怕孤军深入，或者情况不明，不熟悉道路之缘故，鬼子还了几枪即逃之夭夭。

下矮崖村离上矮崖村不到两里。我们一家 10 多口人，除了我父亲和 18 岁的德哥外，都是老少妇孺，所以在这次阻击鬼子之后，父亲便觉得住在下矮崖村也还是有欠安全，便上马山，以竹为架、茅草为“瓦”，搭了五间“鹧鸪寮”（即人字形小草房），把家人安置在山上，躲避鬼子。

那时，马山到处都有“鹧鸪寮”，逶迤连绵七八里。住在“鹧鸪寮”的人很多，大都是十把岁的孩子和幼婴、妇女。各家各户留在山外的家人，每隔两三天都会进山一趟，一来看望家小是否平安，二来把山外发生的事情告诉家人。山外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在“鹧鸪寮”传开，成为人们七嘴八舌的话题。我常常去别的“鹧鸪寮”串“门”走“户”，听大人们讲山外鬼子的暴行和雏容人打“鬼”的“故事”。

鬼子暴行

有一天，我去近邻的“鹧鸪寮”串门，听大人们说事，正好碰上一个从瞭望村刚回到山里的年轻人，给马步村沈寿甫（注：解放后，沈寿甫因通匪罪被剿匪部队枪毙）、沈文笔等人诉说刚发生在瞭望村的一件骇人听闻的鬼子暴行。

那个年轻人含着眼泪说：“前天早晨，有七八个驻扎在雏容的日本鬼子经由盘古、崖面到瞭望村打掳。当时我们听到枪声，就知道是鬼子来了。年轻力壮的，一个个拔腿就上了村边的牛仔山。唯有满奶跑得慢，给鬼子捉住了。鬼子押着她进村，捱家捱户地翻箱倒柜，挖地窖，撬楼板，砸水缸……折腾了老半天之后，便把满奶押到村边的草地上轮奸。奸后还用锄头把插进她的阴部里。鬼子施完暴行走后，我们立即赶回村去。当我们找到满奶时，不看犹可，一看，一个个都大哭起来。因为，在满奶下身的草地上全是血迹，满奶早已气绝身亡，其情其状，惨不忍睹。满奶死得好惨啊！”

听了那个年轻人的诉说，大伙都气炸了肺。沈寿甫大声吼叫：“小日本鬼子都不是娘养的，丧尽天良，惨无人道！若不教训教训这帮禽兽，报此仇，雪此恨，枉为国人！”在场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都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叫喊起来：血债要用血来还！狠揍小鬼子，为满奶报仇！

瞭望伏击

沈寿甫、沈文笔等人都是血性汉子，深明民族大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第二天，便在马山拉起了十几条枪——有土驳壳、土拉八、湖北漏、大拾枪、双筒漏壳、鸟枪，还有一杆土造台枪。十几个青壮年人经商量之后，决定在瞭望村边的牛仔山上埋伏，等待战机。

果不其然，不几天，又有七八个鬼子打着一面膏药旗，由崖面村向瞭望村开来，一

边走一边放枪，企图越过瞭望村到马步村打劫。当鬼子出了瞭望村进到牛仔山脚时，沈寿甫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在山腰的十几条枪一齐猛烈开火。特别是那杆台枪，大显威力，枪一响，百多个铅码像一张大网，向鬼子们“罩”了过去，直打得鬼子蒙头转向，乱叫乱窜，胡乱地向山上放了一阵枪，便仓皇向雒容逃跑。初战告捷！这一仗，打得小鬼子丢盔弃甲，缴获了鬼子一枝“三八大盖”，还有鬼子亡命时失落的几顶钢盔和一面“膏药旗”。

次日，从雒容又来了十几个鬼子的“马兵”，还是在牛仔山下，被沈寿甫他们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挥锄夺枪

沈寿甫们在牛仔山打了胜仗后，有一天马山来了一个肩扛一枝“三八大盖”的年轻人。这年轻人说的是外地口音，被人带到了沈寿甫的“鹧鸪寮”里。沈寿甫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他说他是修仁人，姓莫，是在日本鬼子路过修仁时拉来当挑夫的。拉他当挑夫的鬼子们到了俄洲就驻下来看守铁桥，要他当伙伕，做饭做菜。沈寿甫问他：你的枪是不是在俄洲从鬼子那里偷来的？他说：“是夺来的，是在一块芋头地里夺的。”于是，他给沈寿甫讲了夺枪的经过——

原来，驻扎在俄洲的日本鬼子没有多少给养，常常要到附近的村子打劫找吃的，有时还要伙伕到地里寻找红薯、芋头。这天早上，喝了两碗粥，两个鬼子叫姓莫的青年扛上锄头，押着他到野外给他们找吃的东西。来到一块芋头地时，他看见还有一些没挖完的芋头，就比比划划地跟鬼子说，挖开泥土就可以得到吃的东西了。两个鬼子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叽哩呱啦了一通，要他立刻挖来看看。姓莫的青年一个坎一个坎地挖着芋头，挖出了大芋头后，坎子里还有一窝窝小芋头，乐得鬼子咧开了嘴。可能是觉得这种食物长得很有趣，姓莫的青年每挖开一个坎，两个鬼子就争先恐后地弯下腰抢着去捡芋头。姓莫的青年看见鬼子放松了警惕，又瞅见四下无人，不远处就是山沟、芒草、树林，便打起了逃跑的主意。他趁着两个鬼子忙着弯腰争捡一窝芋头的时候，举起锄头，狠狠地砸到一个鬼子的后背上，还乘机捡起了鬼子搁在地边的一支枪，溜烟钻进了长着芭芒的流水沟里。等到那个没被砸着的鬼子缓过神来，拿起枪“砰砰”开火时，姓莫的青年人已经钻出了流水沟。他跑到了下矮崖村，经人指点，上了马山。

沈寿甫和大伙听了这番讲述，都夸莫姓青年勇敢、机智。

那莫姓青年说，他想回家，但一路上都有鬼子，枪是带不走了，愿意把枪留下，请求沈寿甫给点路费就行。沈寿甫答应了，立即给了他五块光洋，还嘱咐他一路小心，莫再挨鬼子拉伕。那青年一一应诺，告辞而去。

后来，这莫姓青年路过仙姑岭时，在黄阿九家住了两天。他向黄阿九说起了鬼子抓了10多个挑夫，关在俄洲村胡家大院的耳房里。黄阿九邀了5个“铁杆哥们”，趁夜色摸进村里，从虎口里救出了这伙穷苦兄弟。（编者注：详见《鹿寨文史资料》第七辑之《夜闯日本鬼子窝》）

安民“鬼”话

自从阿九们把被鬼子囚禁在俄洲的挑伕解救出来后，这一带村子平静了好些日子。大约过了一个月，又有消息传到马山：雒容城里已经成立了“维持会”，“皇军”贴出布告安民，要求外出的人回到城里去，与“皇军”亲善、共荣，开市营业；还称，“皇军”将给回城的人发放“良民证”，凡持有“良民证”的人都将得到“皇军”的保护。布告还责令各村（街）尽快成立“维持会”，凡成立了“维持会”的村子，“皇军”不再“扰

民”。传进马山的消息还说，马步村村长沈太福已出任马步村的“维持会”会长。

沈太福，40 多岁，是个很有良知的老实本分的农民，仇视外侮。日本鬼子进入雒容之初，他曾与沈寿甫们在牛仔山打过鬼子。据马步村的人说，他之所以出任“维持会”会长，一是为了维护村子的安宁，二是为了更便于了解鬼子的动向，捕捉打鬼子的时机。

我父亲听到这些消息后，自然不会相信鬼子所谓成立了“维持会”，“皇军”再不下乡扰民的鬼话，也不相信什么“中日亲善、共荣”后，鬼子能长久地霸占雒容。尽管如此，但由于有许多家事需要筹措，所以他还是决定和我德哥几个青壮年回到村里去。我祖父已是 65 岁高龄的老人，由于不堪在马山风餐宿雨之苦，也闹着要回去。我父亲拗他不过，只好带他一起回家。

我父亲他们回村子大约不到 10 天，鬼子便到我们村掳掠、拉伕、杀人。据德哥说，那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天刚亮，父亲一打开大门，就看见七八个“鬼子”，头顶雨布，向我们家走来。父亲一看情况不好，立即把大门拴上，并在天井朝天放了一枪，给村里人报信。谁知枪声一响，那些鬼子们便叽哩呱啦地叫了起来，不断放枪，狠命地砸门。这时，祖父还没起床，而鬼子已撞开了我们家的前门。我父亲见要搀扶我祖父逃跑已来不及了，只好和我德哥从后院翻墙逃到了屋背的山坳。

这一次，鬼子在我们村抓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我年迈的祖父，一个是同村的老徐，还有一个是只有 12 岁的黎十一（黎十一解放后到角塘村上门，曾当选为村干部）。鬼子把他们押到我家的大门口，有个鬼子拔出刺刀，指着我祖父，叽哩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我祖父耳背，更不懂日本话，只好一时点头，一时摇头地应付着。那个鬼子见他不声不响，不禁大怒，立即用刺刀从他的领口往下一划。这一刀不仅把我祖父衣服上的纽扣全部划掉，而且还在他的胸部划出了一道血印。之后，那个鬼子在我祖父身上搜去了 10 块光洋，这才把他撂到一边。

老徐当时站在我祖父身边，看到鬼子那般的凶神恶煞，生怕遭到鬼子的毒手，便瞅了个机会，转身向我屋边的那条旱沟逃去。鬼子立刻朝老徐放了一枪，打在他的脚上。老徐应声倒地。鬼子以为他被打死了，所以才丢下不管。随后，鬼子们押着黎十一进我家翻箱倒柜，撬楼板、砸水缸、折腾了好一阵之后，还拉了一地的屎。他们把在厨房里搜到的 30 多斤米让黎十一背着，随他们“开路”。

当鬼子离开我家，走到前院，忽然听到耳房里传出扑哧扑哧的声音。有个鬼子闯了进去，看到床上有个盖着被子的人在喘气，立刻用刺刀挑开被子一看，竟是老徐——老徐不知什么时候爬到这里藏身。鬼子见老徐还活着，很不解气，朝他连补三枪，把他活生生地打死在床上。

这就是成立了“维持会”，“皇军不再扰民”的血淋淋的注脚！

袭击粮船

转眼到了年边，一天，沈太福忽然通知马步村所属村子的人到马步村开会。为了知道鬼子葫芦里装的是什麼药，我父亲便叫我德哥去听听。

德哥回来后，父亲问他：“太福讲了些什么？”德哥说：“太福讲，扎在中渡县（今属鹿寨县）的鬼子在寨上、黄腊一带，挖开了五六个地窖，掳到了 30000 多斤谷子。鬼子要把那些谷子运到柳州去，由于雒容铁桥已毁，便决定用船运。城里的维持会来了通知，要在马步征调 40 个民夫，到寨上帮鬼子把谷子挑到鹿寨码头上船。”父亲问：“有人敢去吗？”德哥说：“开初个个都讲宁可上马山也不去给鬼子挑谷子。可是太福说，不可以不去的，还说眼光放远点嘛，去把这批谷子挑到鹿寨，自有好处。当时就有人呛他：给鬼子挑谷子就是汉奸，能有什么好处？太福说：天机不可泄——这个好处到时候

大家自然会知道的。大伙都晓得太福是个有心计的人。他讲的什么‘天机’，就是他肚子里的‘小九九’。听他这样一讲，大伙心里也就有点数了，都说愿意去做挑夫。”

父亲听了德哥这么一讲，笑了笑说：“太福机灵着呢，其中一定有‘戏’，我们等着看热闹吧！”他旋即问我德哥：“你也去吗？”德哥说：“人家载洪、载仁个个都去了，我身强力壮，不去不怕给人家说是胆小鬼嘛！”父亲说：“去的好。去了可以长点见识，还可以看看鬼子要搞点什么鬼名堂。不过，得长个心眼，机灵一点。”

果然，当我们村的民夫在寨上村给“皇军”挑谷子到鹿寨，回到村里的第四天便传来了好消息：鬼子的运粮船开到金鸡码头，便中了胡光元、沈太福和鹿寨船佬大梁亚满合谋的“水陆配合，伏击夺粮”之计，打了一仗，袭击了鬼子的运粮船，不仅夺回了被鬼子在寨上、黄腊劫掳的30000多斤谷子，还打死了押运粮船的12个鬼子，缴了12枝“三八”枪和400多发子弹。

大伙听到这个消息，都拍手称快，都讲胡光元、梁亚满是好样的，这一家伙干得漂亮！

欢庆胜利

经过金鸡码头“夺粮之战”后，也许是由于战局的原因，日本侵略者已是强弩之末，驻扎在雒容、俄洲的鬼子兵的嚣张气焰已大大收敛。他们有一两个月没到我家那一带的村子打掳了，雒容城乡的老百姓安定了许多，回城回家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每逢雒容圩日，附近一带村子的民众也敢进城做买卖了。但在做买卖时，“皇军”只准使用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不准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币”，也没有人使用铜板、银元、光洋。

这时，我父亲见时局稍安，才让我们一家老小回家过年。这个年过得了无兴趣，没有杀猪，没有炮仗，也没有往昔过年必备的马叶（也叫叶子粑粑）、粽子、糖米饼等等小食品。过完年，村子里的人就忙着春耕，引水灌田，犁田耙地，播种甘蔗、花生、玉米等作物。一来二去，又过了几个月，到了8月下旬，雒容县城又传来消息，说日本天皇裕仁已经颁诏，宣布日本战败，要在华之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中国当局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雒容的四乡八里，民众欣喜若狂。我父亲立即叫我德哥买回好几卷连珠挂炮，杀鸡宰鸭，供奉祖先。雒容城里，不管大户小户，几乎家家都燃放炮仗，庆祝抗战胜利。

鬼子进村

●廖茂乾

1944年，春节刚过，人们正在开荒挖地，送肥下田，准备春种。思力村里时常出现扯牌看相的算命先生窜来窜去，还有挑着铁锅、缸瓦的商贩游村叫卖，愿意赊着不收现钱，秋后才来结账。那时，东洋鬼子早已侵略中国，上海已经沦陷，人们怀疑，这些陌生的来路人是不是汉奸？可是，春耕还得进行，哪管秋后是否得收。直到收完早稻，到了八九月间，二苗老禾正耘田圆根含胎的时候，人们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每天，村边

的公路上，一队队难民从桂林下来，往柳州方向走去。有的难民在村前的水井边停留休息，生火做饭。村里的老人问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说：要去贵州独山。如今，时局动乱，武汉沦陷了；“千猪百羊万担米，不够一锅煮”——长沙也保不住了！

听了难民们的诉说，一时间，人心惶惶。平时抓兵拉伕、派钱要粮，都有乡长、村长来追办，现在这些人都不见面了。人们都赶着抢购食盐，囤积食品。村里的许多人家都忙着抢收还没成熟的谷子，晒干后收藏起来。有的人远走他乡投亲靠友避难，余下的人晚上都躲进山冲和村后的石山岩洞里去。一到晚上，村子里空无一人，死一般沉寂。70多岁的潘成举老人卧病在床，怎么也不肯跟儿子潘润松进山冲里躲避，漆黑的夜里，只有一盏茶油灯发出昏黄的光，陪伴着他。几天来，儿子天亮后给他送来吃的，天黑前就匆匆离去。

这天，太阳下山了，不少人照例藏在村后的石山上。天黑时分，村子里突然传来嘈杂声，同时冒出了火光——鬼子进村了！不多久，人们隐隐约约地发现，几个鬼子正摸上山来。不知是谁，从石缝里放了两砂枪，铁砂朝鬼子撒去。鬼子们立刻朝冒烟处还击。枪声惊动了正在给儿子喂奶的潘阿姨，她惊慌得来不及抱上孩子就往石缝里钻。孩子哇哇大哭，一直哭到深夜。鬼子摸不清山上的情况，不敢贸然搜山，在村里闹腾到天亮才离去。后来，潘阿姨的孩子取名叫“老难”，为的是记住这个受苦受难的日子。

却说第二天人们回到村里一看，只见村子里一片狼藉，许多门板、门框被鬼子拆下来烧火，藏在夹墙里的谷子被鬼子挖走了，谷粒撒得满地都是。潘润松忙回家看望父亲，一进房间，就目睹了一幕惨景——潘成举老人被鬼子活活烧死了！

第三天晚上，天气寒冷，整夜下着雨加雪。半夜时分，西北边的长塘至黄冕方向，枪声密集，炮声隆隆，火光撕破了夜空。直到天亮，枪炮声才稀疏下来。这时候，躲藏在山间的人们，谁也不敢生火做饭，怕被鬼子发现。有个别胆子大的，悄悄地摸下山去，寻找打仗后丢弃的东西。有的人竟成担挑回了国民党兵丢下的衣服和被子，还有的检到了不少子弹和手榴弹。原来，是国军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几天后，死在路边的尸体开始腐烂，到处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好久都没有人敢走这条路。

本来，人们以为躲在山里是很安全的，没想到鬼子还是跑到山里来了。有一天，土妹和桂娘在厂棚里哄着不到两岁的茂盛睡觉，突然两个鬼子出现在厂棚前边。土妹喊：“鬼子来了！”姑侄俩忙往芭芒丛里钻。幸亏茂盛已睡着，没哭没叫，没引起鬼子的注意。鬼子转进了茶林，来到恒祖叔公的厂棚，用枪指着他们，说了两句叽哩咕噜的日本话，回头就是一枪，打死了他的猪，接着用刺刀开膛破肚，让年近70的恒祖叔公将猪肉送到板勒村才放他回来。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伙驻扎在新村的鬼子，进山来掳掠吃的。有了这次教训，大家一商量，决定派人轮流放哨，鬼子来了就赶快跑。从此以后，在燕子山顶设了个哨位，上可以看到洞光，下可以看到长塘；石山背也设了一个哨位，监视着村子两头的公路。每天每个哨位派两人站岗，以“信号树”为标记，树倒了，就是鬼子来了；树倒向哪一边，就指示鬼子从哪一边来。

在山里躲了几个月后，又要快过年了。过完年还要耕种田地，不然今后吃些什么？听说鬼子在别的村组织了“维持会”，有了“维持会”，就是“良民”。于是，就选派几个人到黄皮、波井去探问，然后这些人就到鹿寨去联系。这几个人回来时，带回了几个“维持会”的袖套，以后鬼子来了，就由这些人出面应付。

小年夜到了，一些人回到村里打扫房子，准备搬回家过年。几天来，倒蛮平静，没有鬼子来村里骚扰。到了农历二十九、三十晚上，好多人都回来了，只是小孩、年轻人还留在山上。哪知道，人们正准备吃饭，鬼子又进村了！满村都布满鬼子，车的车，马的马，人们想跑也跑不了。几位维持会的人员带着袖套，在村里窜来窜去，应付着安排

住宿。这些鬼子在村里住了一天两夜，年初二一大早才开拔。各家各户都留意着，担心鬼子掳走了什么东西。我母亲与我看见一个鬼子从宏英家端出一只沉甸甸的箩筐要装到马背上。那箩筐是我家的，我母亲上前交涉，想要回箩筐。一个长着大胡子的鬼子小头目把一只空箩筐丢过来说：“个刚！”（日语，意为“我与你换”）母亲做着手势：“这个不是我家的。不是我家的东西我不要。”大胡子鬼子扯出刺刀，吓得我母亲赶紧就跑，回到家“乒乓”把大门关上。幸亏鬼子急着要开拔，才没有追来，避过了一场灾祸。后来听宏英说，那箩筐里装的是马肉，鬼子在她家偷杀军马。鬼子走后，不到半天工夫，人们又搬着东西，都跑到山里去了。

有一天，几个回村里拿东西的人在潘太光门口议论着什么，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有人叫喊：“这是日本鬼的飞机！”大家立刻跑开，刚跑到庆渊家门口，两轮机关炮就从飞机上扫射下来，直打得尘土飞扬。一颗燃烧弹击中祖光叔公的茅屋，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幸好没有人伤亡。又过了10多天，人们在村子前面的田垌里干活，又有两架日本鬼子的飞机飞来，人们拔腿就跑。飞机丢下几颗炸弹，落在燕子山脚下爆炸，留下几个五六尺宽的弹坑。后来大伙精了，听见飞机声就就地蹲下或卧倒，几次飞机飞过也没有事。

时令到了初春，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但在蒙蒙细雨中，被烧过的荒山，草木开始泛绿了。记得那天我和德盛舅公在六用岭放牛，捡来干树枝在田基底生火取暖。忽然冒出四个鬼子，端着枪指着我们不许动。因为我穿着一件捡来的国民党兵的破棉衣，一个鬼子拉动枪栓朝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是中国兵！”德盛叔公赶忙跪下说：“太君，我们是‘良民’。”又指着不远处的牛说：“我们是放牛的，不要杀我们。”另一个鬼子抓住我的手，咿哩哇啦着什么。我用树枝在地上写着：我是良民，是放牛的，住在那边村子，你要粮食、要糖，我带你们去。那个会说半生不熟中国话的鬼子，似乎明白我写的字，做着手势要我们带路。走到六艾路口，岭上放哨的人看清是我们了，立刻把“信号树”放倒，并叫喊着德盛老人挨鬼子抓了！我的母亲在那成做工，看见是我，连忙跑去找我叔爹。叔爹叔侄俩飞快地跑回村里找“维持会”。我祖母在陆光做工，听到我被鬼子抓住的消息，也拼命往村里跑，一路哭喊：“我陆养（我的乳名）挨鬼子抓了，快救我孙仔呀！”那年我14岁，懂得有时间就有救，走在前头，故意放慢脚步，拖延时间。走到学校面前，叔爹和潘宏均、潘增仁几个人戴着“维持会”的袖套从塘边走过来，四个鬼子也围了过来。我趁他们和鬼子交涉赎人的时候，从潘和生家的峰山头旁边遛往后山去了，德盛舅公也回头放牛去了。半小时后，四个鬼子背着得到的东西往长塘方向去了。

几天后，世德伯爷和世生叔爷从小路去长塘，想打探鬼子是否还在那里。刚到六纯坳，就遇上了两个鬼子。鬼子向他们开了两枪，两人都被击中——弹头从世德伯爷的“饭焦骨”底下打进去，从心窝边射出来；世生叔爷荷包里装着个手榴弹，正想掏出来投掷的时候，被从左腹部打进、从右腹部穿出的弹头击中右手掌。兄弟俩拼命地跑，满身鲜血淋淋，跑到六纯坳口，都走不动了。后来，两人互相搀扶着，好不容易才回到那成住处。消息传出，许多人都跑来看望，有的带来了草药，有的帮忙用南瓜瓢敷伤口。世生叔爷的伤半年后才治愈，可右手掌终身致残；世德伯爷的伤一直治了两年多才好。

初夏的一天，轮到我在石山背放哨。清早，燕子山顶那边竖起了“信号树”，我也把“信号树”竖起来。人们凭着这两棵“信号树”，放心地在田里耘早稻，插中禾、老禾。下午四点多钟，燕子山顶的“信号树”突然倒下，放哨的人大声叫喊：“鬼子从长塘那边来了！”我也放倒了“信号树”，跟着大喊。田垌里的人很快就跑光了。半小时后，鬼子从陆光路口走了过来，前面是20多个尖兵开路，离他们几十米远是密密麻麻的队

伍，有骑马的，有步行的，还有用马拉着大炮的。我在石山背透过树丛，看得一清二楚：上千个鬼子大摇大摆地走着，走在前头的，已到了大往村路口，走在后头的还在我们思力村背的上坡处。

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了两架飞机，一高一低，盘旋了一圈，突然向鬼子开火。盘旋一圈，就是一轮机关炮；接着再盘旋一圈，又是一轮机关炮……炮弹像冰雹一般落在鬼子队伍中间，硝烟和尘土笼罩着长长的路段。鬼子们吱喳鬼叫，乱成一团；有的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生怕飞机再杀一轮回马枪。飞机飞走了好久，他们才敢爬起来，打理伤员和尸体。

第二天早晨，一些人来到飞机扫射过的现场，想捡些遗留的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是遍地血迹。不过大家都很高兴：哈哈，小鬼子也有今天！忽然有人发现，在距离公路 10 多步远的三个牛练塘里，埋满了被打死的马匹。这些马，个个肥噜噜的。好久没闻到肉腥味的人们蜂拥而上，随身带着匕首的，立刻动手割起了马肉；空手而来的人，马上回家拿刀。我是去得落尾的，也割得了 10 多斤马肉。割得多的，拿回去分给左邻右舍。这是我们思力村的人第一次尝到马肉。人们议论纷纷，看样子，鬼子要败了，光复的日子不会很久了！

1945 年 8 月的一天，燕子山顶的“信号树”突然倒下，石山背的“信号树”也随之放下一——鬼子从鹿寨方向来了好多！村里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很快跑光了，都到山里躲藏起来。藏在高处的人们看到，公路上行走着好长好长的队伍，看样子却不像是鬼子兵，因为队伍里夹杂着不少难民。他们都不进村，到村边的水井打水之后，又朝着寨沙方向走去。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支队伍是国军！人们奔走相告：光复了！光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被日寇击落的两架“飞虎队”战斗机

●谢汉卿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我还是个 12 岁的少年，家住洛埠街上（当时属雒容县管辖）。当年，听我父亲谢剑、堂兄谢荣德以及农彪叔讲，这年 5 月，有两架美国援华抗日“飞虎队”的战斗机被日本鬼子击落，坠毁在洛埠和雒容这两个地方。

那是 5 月的一天上午，两架执行任务的“飞虎队”战斗机（每架战斗机只由一个驾驶员操作）由柳州往洛埠、雒容方向飞去。不知怎的，驻扎在雒容县城的日寇提前得到了情报，派出半个班的鬼子，扛着两挺机枪和几支步枪来到靠近洛埠的南庆村一块甘蔗畲里。这块甘蔗畲大约有 4 亩多，蔗苗才长出一尺多高。鬼子兵把一面巨大的中华民国国旗铺在畲地中间，周围又用竹杆插满了国旗，还把国旗绑在附近高山岭项的松树梢上。“飞虎队”两架战斗机的驾驶员误认为是中国军队，于是作低空飞行，观察地面情况。狡猾的鬼子埋伏在畲地附近，用两挺机枪猛烈射击，打中了这两架飞机的要害。驾驶员这才知道中了鬼子预谋的圈套！

其中一架飞机被打中油箱，立即起火，往洛埠方向摇摇晃晃地飞行，最后坠落在距离洛埠街东面 2 公里外的蚂蝗桥谢家杉树山冲沟里。当时，洛埠街陈阿火的父亲农彪去

蚂蝗桥做农活，远远看见一大片被冲倒的杉树林。走进山沟里一看，原来是一架美国援华抗日飞机。飞行员被机身活活地压死了，流了满地的血，惨不忍睹。他马上跑回洛埠街向乡长骆宗棋报告。骆乡长立刻派自卫队班长老农带领两名队员赶去现场。他们将牺牲的飞行员抬回洛埠街，后来在洛江花园（即现在的食品站背后）简单地埋葬了。飞行员的手枪交由骆乡长保管。不久，雒容县府派人到洛埠处理后事。由骆宗棋带领一帮力气大的人来到飞机坠落的现场，将还能修复的动力部份、无线电器材及其它还能用的机械零件拆卸下来，用牛车运回洛埠乡政府，日后再上交。

另一架飞机被击中动力部位和螺旋桨，后来坠落在雒容城外。被迫跳伞的驾驶员落地后，当即被日本兵俘虏了。凶残的日本兵用铁线穿过飞行员的手掌心，还用铁链把他锁住，关押在南庆村的一间小屋子里。日本兵白天不敢把他押送去雒容，怕半路上被抗日自卫队袭击、劫持，准备夜间才押走。南庆村维持会的人立刻将此事向洛埠乡抗日自卫队总负责人何次三（此人于 1950 年被白崇禧任命为国民党“桂中军政区”司令，1951 年 4 月被我人民解放军在平山屯秋剿匪战斗中击毙）报告，何次三立刻在木头村紧急召开洛埠、木头、大正三个乡的自卫队长会议，订出营救飞行员方案。在这三个自卫队里挑选敢死队员，其中有洛埠的老农（班长）、何麻子（乡警），木头乡的潘嵩，大正乡的赖鸿英，还有机枪手孔宪飞、孔宪玉，步枪手许伟民、李群华等。

敢死队由农班长带领，机枪手和步枪手埋伏在南庆村外，几个拿驳壳枪的队员由维持会的人带路，趁日本兵正在吃晚饭不大注意时，悄悄摸到了关押飞行员的地方。可是，还是被鬼子兵发觉了，双方交战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将飞行员救出村外。随后，敢死队迅速撤走。他们让受伤的飞行员骑着马，送到柳城县与洛埠交界的大山沟里，在只有 10 多户人家的黄塘、石甲两个小村子里轮换住下治疗养伤，配备了一名中学毕业的人当翻译，还有一名医生、一名保卫人员、一名炊事员。听说被救下的是来帮中国打日本鬼子的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村民们每天都乐意为他提供鸡、蛋、鱼、肉，让他好好地调养身体。

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 年）三月上旬，乡长骆宗棋才派老农班长和何麻子两人去黄塘、石甲，把这个疗伤的飞行员送回洛埠乡政府。中旬，柳州国民政府派了几名官员和一位翻译来到洛埠，把他接回柳州。骆宗棋陪同他们去洛埠火车站时，经过我家的门口，我亲眼看见了这个美国飞行员——他身高一米八以上，不肥不瘦，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满脸红光，身上穿有蓝色卡几布军装，左臂戴着有美国小国旗和“飞虎队”标志的臂章，左胸前还挂有胸章，是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军官。据说，到柳州后不久，他就返回美国去了。第二年的夏天，另一名牺牲的飞行员的骸骨也运回了美国。

寨南村的红色历史篇章

●覃德礼

解放前，寨南村归属修仁县四达乡毓秀村管辖。建国后于 1950 年划归第十区白合乡，撤区拼乡后为四排乡白合村的一个屯，延续至今。当时全村共有 44 户 154 人，其

姓氏除李、唐、赖、潘各 1 户外，其余 30 户均为覃姓；而后来于 1951 年增添了一户梁姓，是平地村农会主席梁喜燕为逃避土匪杀害，被迫携妻带子来到这里，后参加土改而在此定居。寨南村的人民群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中，书写了一页页红色的篇章。

1948 年 7 月至 1949 年 2 月，村人覃纪祯在柳州龙城中学附小任教。期间，中共象州县负责人陈钜动员他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之后，党组织派他回原籍修仁县开展地下活动，先后以和木小学、四达中心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会同党组织派来的外籍党的地下工作者徐家贞、黄爱群、胡建平、邓爱珍、覃清宇（剿匪时阵亡）等人一道开展地下工作。覃纪祯于 1948 年 8 月至 11 月任修仁县山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桂中游击队第八中队队长；1949 年 11 月任桂中人民解放总队挺进队宣传干事；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四排地区的地下工作队伍迅速扩大，游击运动轰轰烈烈，其范围涉及到思民、白合、和木、中平、德占、高椅等村屯，游击队员发展到 40 多人；寨南村则成为四排地区的地下工作根据地，参加游击队的计有覃杰、覃纪福、覃世芳、覃纪瑛、覃恩铭、覃大卓、覃大周、覃纪安、覃恩昌、覃喜芳、覃纪德、覃大英、覃纪长、覃桂芳、覃纪深、覃恩堂、覃荣芳、覃恩修、覃桢芳共 19 人，尚有非在册通讯员（四达中心小学学生）覃增修、覃纪玲、覃德礼 3 人。当时，党的地下活动使国民党政府心惊胆战，多次组织抓捕、暗杀行动。修仁县伪政府经常派遣敌特到圩镇、农村、学校刺探情报，四达中心小学的算术老师谢日香就是国民党安插在学校的特务（此人在解放初因参匪被俘而后被枪毙正法）。1949 年夏，修仁县伪政府曾贴出《公告》，悬赏 500 大洋捉拿覃纪祯。因此，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不得不隐姓埋名潜伏起来，暗中指挥地下游击队的活动。此时的寨南村，已成为四排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和指挥部。

1949 年 9 月初，修仁县特编中队长廖振邦带一个排的特警包围四达中心小学，企图抓捕覃纪祯。由于覃纪祯早已得到情报，迅速从学校撤离，回到寨南，让敌人扑了个空。次日，伪乡队副韦圣威又带领乡警直扑寨南村，岂料被以“乡长”作掩护的游击队员覃大周知悉，急派乡警覃颖芳把书信送到四达中心小学交给覃增修、覃恩堂。此二人跑步急回寨南，直奔覃纪祯家的楼上，交给了正在开会的韦颖和覃纪祯，使之得以紧急撤离，让敌人再次扑空。

1949 年 9 月下旬，修仁县特编中队长黄桂发和廖振邦各带一个中队，分驻十锦乡（今和木）、四达乡“清剿”我革命武装，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我地下党领导人韦颖、覃纪祯、李明研究决定，待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以鼓舞民众。10 月中旬，接到情报：黄桂发带一个班长到四排公干。于是，遂派游击队员江波、覃桢芳、温有权埋伏在寨南村波崇坳杉树山上，当场击毙罪大恶极的黄桂发。第二天，在四排街上张贴了惩办反动分子黄桂发的《公告》，广大群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敌人则惊恐万状，当晚驻十锦乡特编中队连忙撤离。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次日另调兵遣将，由修仁县伪常备大队长韩志仁率领警察包围寨南村，搜查了覃纪祯家。他们抓不到我地下游击队员，即把全村群众集中在晒坪上，威胁利诱群众交出覃纪祯和“凶手”，而群众守口如瓶，没有一人“反水”告密。最后，韩志仁只得领着警察，垂头丧气地走人。

1949 年 11 月，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桂中游击队 70 多人组成挺进队，于 15 日从象州古院行军到寨南大叶岭宿营，16 日进驻寨南村。期间，在村里举办了革命培训班，共培训农民骨干 70 多人，而后开展筹粮工作。覃纪祯带领 20 多名挺进队员北上，寨南村的群众给挺进队员送来了布鞋 20 多双、草鞋 70 多对。当晚，挺进队员与群众 300 余人在村头晒坪举行联欢晚会，直至深夜 12 点多钟才依依惜别。

1949年11月28日上午，挺进队在头排岔路口（地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145师会师，场面一片欢腾。随后，解放军继续南下解放柳州，挺进队则北上挺进修仁，当晚接管了修仁县城。12月上旬，中共修仁县委、修仁县人民政府成立，王文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梁华新任副县长，挺进队的覃纪祯、覃杰、覃大周、覃恩堂等均分配了具体工作职责。

1950年初，土匪暴乱，企图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复辟蒋家王朝。四排及周边地区的土匪十分猖獗，其匪首计有四排的温启君、温鸣武、温海波，里坦村的温伯怀，三元村的韦世振，平地村的梁建图，江南村的刘玉庭，吉云村的闭振熏、闭思儒、闭振新，龙团村的韦永和，甲凤村的卢首春，峰村的廖世德，鹅颈村的黄浩仁，木料村的温孔修……这些反动头目纠集国民党残兵、招募匪众约500多人枪，自称“九路军”，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为敌。

建国前，寨南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桂中游击队第九中队的根据地，解放后成为人民政府的红色村屯，这就自然成为土匪反动武装的眼中钉、肉中刺。匪帮们四处叫嚣要攻打寨南村，要房屋烧尽，老少杀绝，鸡犬不留。而寨南人坚信共产党，拥护红色政权，全村人做好了防匪、抗匪、灭匪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同仇敌忾，团结如钢，势与土匪斗争到底！

农会干部李善经、覃大英、谢鸾英、江善宽、覃恩昌共同研究，决定进一步发动村里的群众，筑围墙，建闸门。在围墙内重点地段设6个隐蔽处和近100个枪眼，抵御土匪的进攻。全村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民兵，配备了武器。武器的来源有四：一是没收地主所获，二是乡政府配给，三是区公所调拨，四是村民自有的鸟枪。当时总共有步枪50多支、手枪10支、鸟枪30多支，台枪一支，子弹1000多发、手榴弹30个。

总指挥覃世芳和参谋覃恩昌召集民兵骨干，共同制定了抗击土匪的作战方案：一旦土匪来犯，先在外围使用鸟枪、板枪、台枪打。这些枪都装有近100粒铁砂，台枪还加装了许多碎钢片，有很强的杀伤力，一枪可杀伤四五个敌人，台枪能杀伤七八个甚至十多个敌人，纵使不死也使其丧失战斗力。若土匪包围了村子，则在围墙内坚守，利用隐蔽处和围墙上的枪眼，力争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各家各户，要常备足够三天的粮食、柴草和饮用水。为安全起见，把高头村的老弱病残者晚上集中到底下村住宿过夜。

1950年5月间，匪首温孔修纠集林秀山、韦永和、黄浩仁等匪部下属的匪众500余人，集中到木料村，谋划攻打寨南村，并派平地村的梁某到寨南村劝降。覃世芳、覃恩昌、覃大忠、江善宽获报后，商量决定：选派精干民兵，埋伏在六金大岭严阵以待，全村人誓与土匪决一死战。众匪首得知此讯，才不敢轻举妄动，终作鸟兽散。

1950年11月16日，土匪再次欲谋攻打寨南村。匪徒们拟由榴江县匪首古少镛部300余人从石人冲经里坦村进入白合糖厂村，晚上12时进驻老寨集结，以图会合江南村的刘瑞庭、金贵村的闭思儒等匪部共700余众，于次日向寨南村突然发起攻击。当派去打探虚实的匪徒回来报告：寨南村民兵已严阵以待，男女老少众志成城，誓死保卫村子，等待剿匪部队支援解围！古少镛等匪首权衡利弊，生怕寨南村民兵与解放军内外夹击，只得放弃原先的计划，不战而退。

寨南村的民兵与群众不但粉碎了土匪两次进攻的阴谋，保卫了自身的安全，还积极协助解放军清剿土匪。1950年冬，覃世芳受派深入六午、金贵等村侦察匪情，向解放军报告。驻修仁的解放军某部获报后，于12月14日拂晓与县大队和武工队分别包围了这两个村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除匪首古少镛带着少数匪徒逃跑外，其余180多匪众全部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匪首温启居、闭思儒在六午村李世耀家的夹墙中被抓获，于1951年在头排街被公审枪决。至此，四排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寨南村

参加此次剿匪战斗的有覃恩才、覃世芳、覃纪瑛、覃纪德、覃恩昌、覃大忠、覃恩华、覃居和、江善宽、李善经等共10人。

1950年至1951年间，寨南村共有8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年冬，寨南村同全县人民一道，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村中虽有2户地主、2户富农，但在解放前地下党活动时期，全村群众受到党的直接教育，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地主、富农也拥护共产党。有的地主、富农把家里的枪支无偿献出，其家庭成员有的参加了游击队和民兵。故此，寨南村的地主、富农在土改工作队的教育下，都同意将土地、耕牛、房屋等家产交给农会，依据政策法规分给贫苦农民，所以寨南村在“土改”全过程中，未出现过戴高帽游村、罚跪、打人的“斗地主”场面，取得了“和平土改”的全面胜利。

在已故、离休、退休的寨南人中，计有正厅级干部1人，副厅级1人，正处（县）级3人，副处（县）级7人，正科级9人。

寨南村人以鲜红的颜色，书写了寨南村光荣的历史篇章！

◆剿匪纪实◆

突出重围

●吴 狄

1949年11月至12月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桂系头目、“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的所谓“总体战”迅速土崩瓦解，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鹿寨县当时包括中渡、榴江、雒容三个县及修仁县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135师前锋部队404团沿湘桂铁路追歼逃敌时，于11月30日上午解放鹿寨镇，11月30日中午解放雒容县城；45军另一支劲旅第134师402团，12月2日解放榴江县城。与鹿寨东北部相连的几个县如百寿、融安、柳城等，亦先后被攻占，只有中渡县全境尚未解放。原因是土匪头目林秀山率领土匪顽抗，以及国民党正规军第985团、交警总队共约4000余人，占据今平山镇为中心的四十八弄，地处边远山区，人民解放军的铁扫帚还来不及扫荡。1949年12月中旬，驻守今鹿寨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146师438团，命令作战股长刘双和及侦察连长李仁堂，率便衣侦察连突袭中渡县城，无费一弹，兵不刃血，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及伪县府收缴了敌人大部分枪弹。伪县长陈伯明及驻在城外三湾村的常备队中队分队长蒋尧昆等少数敌人，慌忙逃往山弄中的茶胆村。

当天黄昏后，人民解放军侦察连撤出中渡，分散活动，侦察敌情，调查民情，绘制图标，为主力部队奔袭聚歼盘踞平山镇之敌捕捉战机。

与此同时，柳北游击队（亦称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在活动地区三江、融水、融安、百寿和柳城等县相继解放后，针对尚未解放的中渡县，也在积极筹划，准备接管。12月中旬，在柳城县太平镇集结待命的第2大队26中队接受了这个任务。

由柳城县太平镇到中渡县城，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穿越四十八弄山区，经上游、屯秋和平山等乡村直插中渡县城；二是沿柳（州）融（安）公路南下，绕道柳城县东泉镇，然后再沿柳（州）中（渡）公路北上，经柳城县上雷及今平山镇九简、大阳等

乡村到中渡县城。前者，道路崎岖，且中途尚为匪首林秀山所部占据；后者路线虽较长，但有公路可走，而主要的是可以在途中避开敌人袭击。26 中队领导权衡利弊并征得大队同意，决定舍近求远，绕道由东泉镇经九简、大阳村直取中渡古城。

12 月 22 日晚上，除留守太平镇人员以外，全队 72 人在中队长侯亮、指导员何柱邦（又名何坤）和副中队长何韬率领下，进驻东泉镇。第二天一早，原计划 8 时出发，因筹粮做饭延误了时间，动身起程时已经 10 点多钟了。

平心而论，60 多年后追述这一段历史往事，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第一，在敌人尚有 4000 多重兵占据平山镇的情况下，一支仅有 72 人的游击队敢于直取中渡县城，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敢精神；第二，侦察失误，麻痹轻敌。人民解放军第 438 团侦察连在 26 中队进军中渡县城之前一个星期，突袭古城中渡后，因距敌平山镇太近已主动撤出，以及敌人经常从哑巴坳出大阳、孔堂、九简等乡村抢粮、抓伏、游动，26 中队的侦察人员并未侦悉，只笼统地报告“无敌情”，且中渡城中又无内应和暗哨，这就犯了兵家大忌：“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23 日早上 10 点多钟，26 中队 72 人由东泉镇向中渡古城进发后，想到即将接管一个县城，由秘密活动即将胜利地公开回到家乡（72 人中，四分之一是中渡县人），指战员们心情是欢快的，一路说笑，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南泥湾》等歌曲。

下午 2 时许，队伍到达九简、大阳村之间的三板屯南面一片开阔地，尖兵报告：“前方丘陵高地（即今太阳村民委一带），有可疑的人。”中队指导员何柱邦因轻信几天前侦察人员“无敌情”的报告，未作紧急处置，只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此时，丘陵上的人越来越多，且左侧小土岭上也出现了 10 多个人。中队长侯亮用指挥旗联络，对方毫无反应。何柱邦便带副班长韦耀前往了解情况；副中队长何韬带尖兵、中队长侯亮带分队跟进，其余队员仍在原地。

何柱邦刚走上丘陵，发觉是敌人，但为时已晚，未及开枪便被俘了。韦耀见势，即滚进路旁的水沟向敌射击，而敌人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向游击队开火。侯亮立即命令一分队利用地形阻击敌人，又命枪榴弹射手轰击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敌人火力。战场上一片硝烟火网，战斗进入胶着态势。这时，带领尖兵的何韬又发现敌人从三板屯方向游击队阵地后方运动，显然是企图断路包抄。于是报告在前沿指挥的侯亮，请他后撤，抢占右侧小高地，以便居高临下，摆脱被动局面。敌人这时吹响了冲锋号，因游击队后撤采取交替掩护、节节抗击的办法，故敌人的冲锋未能凑效。但敌人仍在运动，不时发起攻击，直到侯亮率队抢占了右侧无名小高地，与副分队长周英用两挺机枪火力猛烈阻击进攻之敌，并打倒了几个端着刺刀的敌人后，绝大部分游击队员才跳出包围圈，绕道经思江村，退回东泉镇和太平镇。

伏击 26 中队的敌人，是盘踞平山镇的国民党正规军第 56 军 329 师 985 团 3 营，约 350 多人，妄图一举“吃”掉游击队。是役，游击队牺牲 2 人，指导员何柱邦等 10 人被俘。1950 年元月 5 日，解放军第 438 团继血战平山镇后，又奔袭融安县泗顶镇歼敌主力时，被俘 10 人始脱险。敌人在大阳三板之战中，也被游击队毙、伤 6 人。当时，人们就有评论：“国民党军队是‘脓包’，注定要灭亡的。”“用 300 多人占据有利地形伏击 72 人，不仅‘吃’不掉游击队，反而死伤 6 人。柳北游击队第 26 中队虽然牺牲 2 人、被俘 10 人，但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顽强抗击，犹能突出伏击圈，不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人民武装力量。”

后来，柳北游击队第 26 中队改编为地方武装一部，在配合野战军主力第 438 团及第 215 师等部战平山，攻泗顶，剿灭四十八弄匪患的各次战斗中，仍然能攻善守，英勇

顽强，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1989年秋天，当年26中队负责人侯亮、何韬应县委、县政府之请，回县走访。旧地重游，在差不多40年前的旧战场原址，追怀往事，评说历史，凭吊战友，依然心潮澎湃。

刻骨铭心鱼水情

● 吴 狄

1951年3月20日拂晓至8时许，我所在的部队一举全歼四十八弄古里朝村匪第6支队400多人以后，部队又接到命令：奔袭百寿县三隍镇方向的江头村，务歼盘踞之敌。要求“利用暗夜，隐蔽行动，乘其不备，突然攻击，全歼匪徒”。

恰在这时，可能是水土不服，我突然病倒了。先是高烧头痛，继而呕吐腹泻，仅一天时间，便弄得我走路已经东摇西晃。部队长途行军夜袭，是不能携带病号的。营长和教导员当机立断，把我托付给与古里朝村一山之隔的中渡镇龙登村的一位覃妈妈照料，待部队消灭江头村之敌后，再来接我归队。

覃妈妈一家三口人：她与老伴罗伯伯和年约18岁的女儿。覃妈妈年近60岁，山区生活虽然艰难，但她的却性格乐观开朗；罗伯伯已60开外，两道浓黑的剑眉上下刻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女儿长得清秀俏丽，衣裤虽然补丁，亦难掩其青春倩影。这么一家人，在当时的龙登村世居，其贫困艰辛，是不难想象的。更难能可贵的是，隔壁村古里朝一场厮杀刚过，村庄解放还不到三天，覃妈妈就坦然答应营长的请求，不怕麻烦，不顾漏网匪徒可能的报复，毅然收留和照顾一个“八路小鬼”病号，不能不令人由衷地感激和肃然起敬。

我到覃妈妈家的第一天，靠她扶助，还能勉强行走，但仍然呕吐不止；第二天，则处于半昏迷状态，不时发出梦呓，吵着要跟部队走；第三天，腹中食物早已拉完吐尽，像死人一般躺在床上，而部队留下的药品又已用完，情况很是危急。

覃妈妈与罗伯伯商量后，只得上山寻找山区群众传统的中草药为我治病。这倒也灵验，当晚服下第一剂药汤后，呕吐腹泻便立刻停止了；后又连服两剂，我的神智开始清醒，感到口渴饥饿。覃妈妈立即把珍藏的粳米和准备清明节用于扫墓的黄片糖，为我煮了一小锅稀粥，然后扶起我，一口一口地喂。我虽然只吃了五六口，但覃妈妈双眉舒展，慈祥的眼睛和嘴角浮现出笑影。我的心灵猛的为之一动——啊！久违了，这笑影，记得儿时在母亲身边，我是曾多次见过的。顿时，我感到血管中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第六天，我可以下床走动了，但依旧头重脚轻，仿佛腾云驾雾；第七天，进食与行走才逐步正常，还可以帮覃妈妈往煮粥的灶里添柴加火。“这回好了，这回好了！”覃妈妈很是高兴。她叙说了几天来我病中的情况，还笑着安慰我：“别急，你们营长会来接你的。”

七天内，覃妈妈为我熬药服侍，伴我长夜不眠，眼睛红肿了，形容憔悴了，但她的笑脸却更慈祥了！当夜，我和他们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火塘边，互道身世，才知道覃妈妈原来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943年被寨上村恶霸地主韦梅南抓去当兵，从此下落不明；小儿子死于1947年贫病交加中。老人诉说往事时，流下了凄凉辛酸的眼泪，然后

问我：“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当了‘八路’的兵呢？”我告诉她，因为没有饭吃，没有书读，为了推翻吃人的旧世界，我是自愿参军的。

“自愿参军的？！”老人惊奇了，接着又说：“我的大仔，是被人用绳子捆去的啊！”我便乘机宣传：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欺压穷苦老百姓。共产党的解放军就是过去的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如今是“好铁才打钉，好仔才当兵”。

第九天，老两口见我己能进食，但病后的身体虚弱，竟然把准备清明节用的大阉鸡也杀了，无论我怎么劝阻都不听，而且将两只鸡大腿全给了我，硬是“强迫”我吃下去。我的心灵又一次被震动，想起只有儿时跟父母生活，才会有这种幸福。

部队消灭了江头村那股土匪后，又追歼了两股土匪，第九天黄昏，我们营的副教导员接我归队了。我向他报告了九天来的一切。副教导员听后，感动得紧紧握住两位老人的手，并拿出“光洋”，加倍支付我九天中的一切费用。两位老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弄得很“僵”。覃妈妈说：“你要我收下这些‘光洋’，你们还是人民子弟兵吗？”

第十天清早，当我打好背包，扛起USA卡宾枪，启程上路时，覃妈妈哭了，我的鼻腔也一阵阵发酸。她和罗伯伯送我们走了一里多路。临别，又塞给我10个煮熟了的鸡蛋，对我说：“以后有时间要来看望我们啊！”我向她持枪敬礼，大声回答：“覃妈妈，你是人民军队的母亲！等全部消灭四十八弄的土匪后，我一定来。”

可惜，从此后我便“浪迹天涯”，远走他乡，一别33年。1984年春，奉命回县工作后，我与时任中渡区区委书记的罗谋智、韦在凡两同志，特意重访旧战场古里朝和龙登村，一打听，得知覃妈妈和罗伯伯两位老人已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先后辞世了！然而，从两位老人身上体现出的军民鱼水深情，却永远给我力量。因为我从中看到，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如果真正地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就能无往而不胜，什么前无古人的伟业也能创造出来！四十八弄的土匪，之所以能在1951年3月20日至4月15日一个月内被肃清、剿灭，便是绝好的例证：人民军队代表人民根绝匪患；人民群众热情支持，无私奉献，把军队当成子弟兵，军民鱼水情深！

导江剿匪散记

●杨 骥

土匪的猖狂气焰

解放初期，导江街是导江区政府的驻地。1950年4、5月间，那里没有驻军，也没有地方工作队，土匪经常进街骚扰、掳掠。

4月的一天深夜，街上的狗突然狂叫起来。上头街棺材铺吴老板的老婆六娘拿着一盏炼油灯出门察看动静。离她家不远的土闸门外“叭”的一枪打来，吓得她把手中的煤油灯都掉在地上，惊叫一声：“土匪进街了！”赶紧跑进屋去，关紧了大门。接着，土匪冲进街里，脚步声、打门声、臭骂声响成一片。六娘斜对门的张二姐是个寡妇人家，慌忙用锅底灰涂抹在大女儿脸上，把她盖在大阴沟里躲藏，接着又把两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儿子按在地上，避免挨冷枪打着。这时，屋外传来了猪的嚎叫声——土匪把她家那头平时都睡在廊檐下的母猪杀了。土匪破开猪肚子，发现还没出生的小猪崽，才知道是母猪，

用白话骂道：“丢那妈，系（是）猪哪（母）！”更惨的是几户有钱的人家，被土匪翻箱倒柜抢走了许多财物。土匪闹腾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带着抢劫的财物扬长而去。

打这以后，土匪不时到导江街上骚扰，有时在圩日子大白天也明目张胆地来到街上，在米粉摊喝酒猜码，白吃白拿。老百姓饱受了土匪的祸害。

由于导江一带的土匪十分猖狂，中共雒容县委书记江昌华便亲率县大队一连和二连以及 10 多名地方工作队员，进入导江剿匪。江昌华率领部队到了导江后，摸清了匪情，由佛子、石苟村的农会下部和会员作向导，在佛子、石苟与石路的达梯、六谷一带，和土匪打了一仗，直到把土匪打得鸡飞狗走，才率队返回导江街。做向导的农会干部和会员，害怕部队离开后遭到土匪的报复，有十几个人携家带口跟随部队来到了导江街（其中有石苟的农会副会长韦任良，后任副县长、人大副主任），其食宿均由部队安排和供给。之后，江昌华因筹划剿匪的全局工作要回县城，为保一方平安，便把县大队的一连、二连和 10 多个地方工作队员监驻导江街，以控制匪情，伺机剿匪。

同年 5 月，率领县大队一连、二连在导江驻剿土匪的戴副大队长得了重病，由二连的战士抬着担架护送回雒容县城医治。笔者与导江的三名地方工作队员覃子英、赵中玉、曹 xx 也随同回县。这一消息不知怎的竟让林秀山匪部的参谋卢启贤获悉，在戴副大队长一行尚未启程之时，便纠集了土匪七、八百人，由匪师长赖汉民和副团长卢石兵（卢启贤的儿子）带领，在去雒容必经的下湾村路边设下埋伏，把护送戴副大队回县城的二连围困在下湾村；与此同时，又派了 200 多个土匪去攻打驻扎在导江街的县大队一连。这股土匪，在导江街头的一座土岭（当地人称之为“放哨岭”）上架起了一挺机枪，向街里疯狂扫射。一连副指导员王玉山（后在武装部任科长，转业后任汽车站书记）为防止土匪冲进导江街，便令部队和工作队分头把守街上的各处要隘，伺机还击；还令工作队员李文彩看守导江街姓沈的伪街长，以防其与土匪互通情报，里应外合。此时，王副指导员观察到土匪的机枪火力很猛，即令六 0 炮手向土匪的机枪阵地开炮。只放了两炮，就打掉了土匪的机枪，解除了它对导江街的威胁。虽然如此，但土匪并没有撤出对导江街的围困，仍然在外围向街里打冷枪，一直围困了两天两夜。

两天之后，雒容县县长周春鸣得到了县大队在下湾村和导江街被土匪围困的情报，立即亲率解放军三三大队赶往导江辖区。先在下湾村打垮了卢启贤、赖汉民、卢石兵股匪，解了下湾村之围，旋即驱兵驰援，把围困导江街的土匪打得如鸟兽散，亦解了导江街之围。之后，县大队一连、二连、导江乡工作队队员，以及佛子、石苟村跟随部队到导江街“避难”的农会会员、家属，均奉命撤回县城。直到同年 11 月，雒容县开始了重点剿匪，才灭掉了土匪的嚣张气焰。攻打导江街的林其彰、林其良、卢启贤、卢石兵等各股土匪，在象州县境内的马旦、大乐等地，被我剿匪部队消灭之后，导江才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避免一场敌强我弱的战斗

1950 年 4 月的一天，导江区区长韦颖得到一条情报，说当天晚上将有大股土匪要来偷袭区公所。当时区公所只有工作队员杨骥、胡纯益、朱仕清、小曾以及炊事员老蔡等七、八个人，六、七支七九、土造驳壳枪，连一颗手枪弹都没有。虽说韦区长曾是地下党员，打过游击，有一定的作战经历，但几个工作队员都是刚刚“离开学校门，走进革命门”的青年，小的才 17 岁，最大的也只有 20 岁，毫无作战经验，要与前来偷袭的大股土匪硬拼，是没有胜算的。针对敌强我弱的态势，韦区长审时度势，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告诉我们，土匪夜袭是有备而来的，且人多势众，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我们只好暂时避其锋芒，以走为上。为了避开土匪在导江街的“眼线”，韦区长还告诫大家在转移

之前，对我们的行动严加保密，不可泄漏，并要大家立即做好“走”的准备。

吃过晚饭后，韦区长把大家集中在一起，要大家装成像平时下乡一样，表现出轻轻松松的样子整队出发。由于当时江口有我们的部队驻守，所以韦区长领着我们经磨石冲、相思村向江口方向行进。到了磨石冲，韦区长又见到那个给他报信的老农，并向他进一步问明情况后，便率领大家沿磨石冲的山边小道行进。天黑时，我们经大步村走过南蛇村边，还听到狗叫声。当过了南蛇村走入江口林场的按树林中时，我们迷失了方向。四野黑茫茫的，又不敢打火把，走了很久，转来转去，一直走不出那片林区。这时，大家已经十分疲劳了，但仍然咬着牙爬上了一个小山坡。韦区长说，上了山坡我们就走出危险地带了，今晚就在这个山坡上过夜，等天亮时探明情况再作打算。于是，大家就在那个山坡上和衣而睡，为了安全，还轮流派两个人站岗放哨。

第二天，天刚蒙亮，便有一阵公鸡的啼叫声传到我们耳里。这时，大家才发现：昨晚过夜的小山坡下面，就是江口对岸的新村，只要下了山坡，过了小河，就到江口街了。为避免一场敌强我弱的战斗，我们就这么辛辛苦苦地“转”了一夜。

鹿寨县农会给剿匪庆功会的贺信

1951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一五师召开剿匪庆功大会，鹿寨县农民协会曾给大会发来了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英勇的二一五师全体功臣同志们：

李白残余匪帮，企图死灰复燃，在美帝指挥下，布置和派遣了大批特务，勾结恶霸、土匪组织暴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扰乱社会秩序，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你们不怕疲劳，不怕流血、流汗，不怕高山路远、日晒雨淋，突破一切困难，爬山涉水，痛剿穷追，把全县十二股土匪在两个月中完全肃清，搬下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大石头，打消了农民的顾虑。展开清匪反霸，树立起农民的优势，社会秩序安定，交通畅达，物价稳定，农民得以大力生产。向地主阶级进行退租退押斗争，解决了春荒夏荒问题，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这些成绩，这些功劳，固然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主要的是在师首长亲自指挥及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下换来的，在党诞生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来举行全师庆功大会，这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方面，你们今天为人民立下了大功，另一方面，你们也成了党的好儿女。我们谨代表全县农民向你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慰问，并祝贺大会胜利成功，更祝全体功臣身体健康。

此致
革命敬礼

鹿寨县农民协会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韦在绪 / 供稿）

一段鲜为人知的中共党史

——忆中共四十八弄工作委员会

吴 狄

中共“七大”（1945年8月15日抗日胜利前夕，在延安召开）修改的《党章》规定：因地区社情复杂与斗争艰巨，为加强领导，可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四十八弄工委”，全称“中国共产党四十八弄工作委员会”，正是在特定年代，依照这一明确规定组建的。从建立到撤销，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各县武装力量，彻底肃清匪患、解放贫苦人民、促进土地改革斗争、巩固新生政权，却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白云苍狗，岁月匆匆，尽管过去了60年，如今追忆回想，仍然令人记忆犹新，春华秋实，沧桑巨变。

1951年4月15日，盘踞四十八弄的股匪被我军剿灭以后，周边永福、融安、柳城及鹿寨县相继于1951年冬和1952年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摧毁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度，解放贫苦农民，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巩固人民政权。

然而，“土改”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反封建斗争，引起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拼命反抗；加之重点剿匪斗争中漏网匪首、惯匪及暗藏的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纵横200多华里四十八弄的千山百峒中，仍然有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暗流，如国民党的少将覃正旺和他的四弟、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第4支队上校司令覃丽天，在我军重点剿匪中漏网逃脱后仍在活动；匪第128军团长黄丁犹及其两个儿子也在流窜破坏，曾枪杀我柳城县公安干警和民兵；中渡镇贝塘村惯匪营长覃万国，竟敢混进中渡古城和黄腊村露天电影院，与群众一起看电影！气焰十分嚣张。当我军和公安干警追捕时，这些漏网的匪徒，则利用四十八弄地处上述4个县边界的复杂地形，忽东忽西，时南时北，由这个县蹿到那个县，又由那个县逃到这个县，与我军及公安部门玩起了“游击”战；暗藏的敌特分子亦乘机造谣蛊惑，引起了群众的惊恐和不安。

针对上述情况，为加强鹿寨及融安、柳城县边界四十八弄山区的领导工作，1952年5月24日，经报请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党委批准，中共柳州地方委员会和柳州军分区党委发出通知，组建了“中共四十八弄工作委员会”，人民解放军黄江部队的曾团长任书记，柳州专区公安处副处长兼侦察科长江明任副书记。1952年6月30日，“工委”领导成员调整，原柳北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任书记，鹿寨县长石庆瑞、江明任副书记。“工委”驻地初在中渡古城，后移平山区，直属中共柳州地方委员会领导。柳州地委除了从公安处及四十八弄周边3个县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侦缉力量，统归“工委”领导以外，还请调了人民解放军黄江部队一个加强步兵营，分别驻节中渡、平山和高坡村，严阵以待，随时出击，以安定民心，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工委”成立后，首先侦破、缉捕1950年和1951年追剿及“重点”剿匪中漏网、潜伏暗藏的敌特分子；其次是组织若干个精干的追缉小组，依靠群众和民兵，深挖、穷追公开窜扰的匪首。8月26日，在中渡区高坡村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了6个暗藏的特务、漏网匪首和反动地主。30日，又在平山区召开万人公审公判大会，判处9人徒刑；处决首恶分子4人。10月下旬，在中渡区黄腊、山尖村交界地追击战中，击毙了气焰嚣张的匪营长覃万国。恶贯满盈的匪团长黄丁犹及其两个儿子黄亚六、黄亚于，在柳城、鹿寨两县交界处的东泉镇附近，也被我追缉组和民兵击毙。隐患肃清，群众放心，热情高涨，土地改革及山区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1952年深秋，中共四十八弄工作委员会完成任务后奉命撤销，交还柳城、融安、

鹿寨3个县所属四十八弄山区各区、乡、镇原建制。只有中渡镇贝塘村人、国民党陆军少将覃正旺及其四弟、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第4支队上校司令覃丽天，下落不明。有人说，重点剿匪已为我军及民兵击毙，但打扫战场时却不见尸体；又有人说，重点剿匪时我军穷追猛打，二覃走投无路已经自杀，可是数十年来，从未见群众发现横陈山野的尸骸；还有人说，重点剿匪时兵荒马乱，二覃乘隙逃出包围圈，跑到香港、台湾或海外了，然而，近年来不少鹿寨籍人士自港、台及国外归来省亲祭祖，亦从未听一人论及。

总之，在旧时代亦官亦匪，亦军亦商，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杀人越货、包种鸦片、毒害人民的覃正旺和覃丽天，究竟下落如何？迄今仍然是一个谜。

◆ 岁月留痕 ◆

屯秋铁矿是这样发现的

● 杨胜德 / 口述 蒋向阳 / 整理

1953年，我在屯秋四区工作，先后住在良午小乡的古板、拉范等村屯。回屯秋区公所时，我常走从古板到拉洞村后三帽岭上的山路。在岭上常看到许多褐色的石块。拿在手上与别的石头相比，显然要比别的石头重很多。我想：这么重的石块，会不会是什么矿物呢？

当时，我看到广西省人民政府的报矿知识和号召群众报矿的宣传报导，于是我将在捡回的褐色石块用布包好，依照当时宣传报导的地址从邮局寄出去。大约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上级矿业部门的来信，还有一份化验说明，说是褐铁矿石，有开采价值。因为报矿，我受到上级矿业部门的表彰，发给我一张奖状。

1956年，我被评为报矿积极分子，并得到上级发给的奖金100元，还奖励了一个背水壶、一个日记小册子、一把找矿用的小铁锤和一个放大镜。1957年，我被通知作为广西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出席报矿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可惜的是，当时我因工作变动，调去洛埠而不在平山工作了，这个通知邮去屯秋后转到平山，转来转去，转到我的手上时，会议已经开完了。没能到北京出席这次会议，是我终身的遗憾！会后不久，广西矿业部来信要我邮一张相片去。我邮去后，广西矿业部给我寄来10元现金。当时的10元钱是很可观的，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

1957年，上级矿业部门依据我报矿的地址派来专业人员进驻屯秋，对屯秋铁矿进行勘察。1958年全国大办钢铁，融安、鹿寨两县联合在屯秋开矿冶炼。当年10月大办钢铁结束后，两县准备抽调100名共青团员、50名共产党员为骨干，要在屯秋开办冶炼厂。这个计划呈报之后，未获自治区批准，而是将屯秋铁矿划归柳钢管辖，成为今天的柳钢屯秋铁矿。据说，屯秋的矿藏量可为柳钢提供二百年的用量。

鹿寨县首次飞机播种造林

●廖学敏

20 世纪 60 年代，我县的十二弄、木龙、石路三个边远山区共有荒山 15423 公顷。这三个荒凉山区的共同特点是：人烟稀少，交通闭塞。要想在两三年内通过人工对这片山区进行绿化，比登天还难。1968 年 2 月，自治区相关部门经多次研究决定，采取飞机播种（撒播松树种）造林。经费由自治区和地方财政共同投入 153.92 万元。

飞机播种造林是我县从没有过的新鲜事，要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测设地面导航点。飞机是南北飞向，那地面的导航点就是东西走向，每距离 50 米打一个桩，写上编号。二是向全县人民，尤其是向飞播区内的群众做好宣传工作——讲清这是播种飞机，不是敌机，不能向飞机开枪、打弹弓、扔石头。（为了避免重播、漏播，飞机尽量贴近地面飞行，有时飞过山谷，人站在山顶上可以看见驾机的飞行员。）三是培训导航员。导航员分为甲乙丙丁 4 个组，配有硅 25 报话机、大红旗、手电筒。从报话机得知飞机从柳州机场起飞的信息后，导航员马上把大红旗树起，注视着飞机飞来的方向。远远地望见飞机来了，立刻举起红旗，面对飞机左右摇摆；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了，马上跑到下一个桩号导航……

导航员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甲、丁两个组的导航员，他们每天从驻地到导航点，来回要比乙、丙两个组的导航员多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导航员每天天还没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到驻地，真个是“两头摸黑”。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尤其是春天，头一天预报天晴，第二天早上导航员到了山上，突然下起小雨，或者起雾，或者邻县飞播区的能见度比我县的好，飞机就不来了。导航员到了山上，也只好打转回到驻地。

前前后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奔忙，终于在 1968 年 4 月底完成了我县首次飞播造林的任务。

鹿寨县电影事业的辉煌时期

●韦 仕

解放前，今属鹿寨县的区域内没有电影事业，只是在光复后的 1946-1948 年间，国民党政府久不时派来一些文化教育队到中渡、雒容、榴江等圩镇放些幻灯；期间，德国传教士也时不时在其传教点放映无声小电影。直到解放后，鹿寨县才有了自己的电影事业。

1955 年，广西省电影教育工作队第 21 分队来县内巡回放映，到了下半年，奉上级之命，改为鹿寨电影队（即后来称为第一队）。队长石正豪，队员李乾光、覃廷万。是为鹿寨有电影事业之伊始。

1956 年底，建立电影第二队，队长李乾光，队员黄立璋、韩秀明。至此，鹿寨有两

个电影队。其分工是：第一队负责江口、四排、头排、寨沙、雒容、城关等区的巡回放映；第二队负责黄冕、中渡、平山、龙江、拉沟等区的巡回放映。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到来，也掀起了大办电影的热潮。县委决定，每个公社办一个电影队，并立即开办“红专学院电影系”，培训放映员，为建队作准备。

1959年，成立了中渡公社电影队，由培训出来的人员组成。刘玉学为负责人，闭合福、唐玉英、韦叔芬为队员。活动区域是中渡、平山两个公社。

1962年，成立县电影第三队。队长覃廷万，队员阳从德、李浩刚、李庆祥。活动地区为江口、城关等公社。

1971年，成立县电影第四、第五、第六队，加上先前成立的队，共有9个队在农村巡回放映。

1972年，拉沟公社办了一个8.75 mm电影队，负责本公社山区的放映。

同年，县成立FU-35 mm流动队，专跑各圩镇、厂、矿、场的放映。该队由潘敏政负责，队员有李景源、洪念信。

1973年，县电影站无偿调拨8.15 mm一套机器设备给黄冕公社爱国大队（瑶族），创办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电影队。

1976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采取国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办电影事业。以雒容为试点。全公社14个大队，队队办起了FL-16 mm放映队（集体办），同时成立了“雒容电影管理组”，负责各队的业务活动管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带来了电影事业的巨大发展。按照符合办队条件和布局的原则，不论是集体或是农民个体办队，都给予批准，经济困难的队，上级公司和县公司相应采取赊账扶助措施，先让购买机器设备，余下欠款订计划逐年归还。这个时期，农村民办电影队迅猛发展。1980年全县民办队（16.8.75 mm）66个，1981年发展到79个，1982年发展到103个，1983年发展到126个，1984年发展到133个。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了自己的电影队，放映点覆盖全县山村角落，村村寨寨都挂银幕，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占领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我县电影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

大旱之年生产自救

●黄诗美

1963年，鹿寨县遇到了极为严重的旱灾，境内许多山塘水库干涸、溪河断流，人畜饮水十分困难。中渡镇大井一队280亩水田，头苗只有40亩过禾镰，粮食严重歉收；二苗因为缺水，连一根秧苗也无法插下。全队120多口人吃水，要到4里外的“小闷”（小泉水）去挑。

面对肆虐的旱魔，大井一队队长黄后珍发动“三长五员”（队干）和社员群众，认真领会上级“坚持抗旱，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指示精神，结合本队的情况，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这年8月，黄后珍组织青壮年劳力，到30多里外的鹿寨镇窑上生产队购买红薯藤

苗，挑回队里；种下了 40 亩红薯后，用龙骨车车水抗旱保苗，还安排劳力到荒坡上铲草皮，烧成火土做肥料。秋后，红薯大丰收，平均每户社员分得 40 多担，家家户户连床底桌底都堆满了红薯。

收了红薯，解决了社员们肚饿之忧，但红薯毕竟是杂粮。要想让社员有钱买米，必须开展副业生产。队里的“三长五员”研究，决定熬炼樟油。大井屯后面有近 10 棵在清朝年间就种下的大樟树，1958 年“大办钢铁”时，已经被砍掉了，烧成木炭作炼铁的燃料，剩下的只是树兜。队里一边安排几个会木工的社员，用旧谷桶木板制作蒸笼，一边安排劳力刨挖樟树兜、上山砍杂柴，土法上马熬炼樟油。樟油终于熬炼出来了，挑到镇上卖给了供销社收购站。就这样，经过 3 个多月的苦熬苦练，平均每户社员又有了近百元的收入，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就这样，大井一队的社员群众在大旱之年，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度过了灾荒。

国营商业四十年

●杨 骥 韦健祺

1950 年至 1990 年，鹿寨县的商业基本是国营经济的一统天下。本文简述的，就是先后所成立的国营公司及其发展与变化。

一、贸易公司 1950 年 1 月 22 日，成立榴江县贸易公司；同期，成立雒容县贸易公司。1952 年三县合并为鹿寨县后，即更名为鹿寨县贸易公司，地点设在鹿寨镇十字街，即今县工商联办公处。公司人员以部队转业干部为骨干，还有广西“革大”分配来的学员和在地方招收的知识青年。公司的第一任经理是孙嘉本。经营的主要商品有食品、杂货、百货、棉纱、布匹、中药、西药，以及人民生活必须的粮食、食盐、火柴、煤油等；还收购黄糖、油脂等农副产品，并在雒容、洛埠、江口、运江、寨沙、黄冕、中渡、四排等地设立购销处。生意做得很活，购销两旺。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业务的需要，由基本上属于综合经营的国营贸易公司又分离出若干个专业经营公司。如 1956 年分离出来成立的水产组，经营水产品，但后来由于业务小，又于 1957 年撤销，复归贸易公司经营。

二、百货公司 在柳州市百货公司鹿寨营业处的基础上，1954 年成立鹿寨县百货公司。第一任经理李平昆。主营百货、五金、布匹、棉纱，并接手经营原贸易公司经营的有关产品，还收购黄糖外销。实行布匹凭票供应后，负责按人口发放全县定量布票，直至改革开放后，发放布票的业务才取消。

三、花纱布公司 成立于 1955 年。第一任经理谢振武。将百货公司经营的布匹、棉纱、棉花划归该公司经营。1957 年撤销，业务归还百货公司。

四、食品公司 成立于 1954 年。第一任经理高中。经营生猪、菜牛业务。除定量供应全县非农业人口外，大部分外调区内外城市和出口港、澳。后来，对农村实行生猪“派一留一”政策，公司即扩大鸡、鸭购销业务，并在波井村建立养猪场。

五、糖业糕点公司 1956 年成立。将百货公司经营的黄糖业务划归其经营，扩大糕点生产。1958 年撤销。

六、盐业公司 1952 年成立，原名盐业站。第一任经理叶贵。盐由外省调入，除供应生盐外，还熬制熟盐供应市场；除供应本县外，还供应荔浦、永福、金秀等县与鹿寨

毗邻的乡镇。在鹿寨、寨沙两地设有战备盐仓。上世纪 80 年代划归柳州市盐业公司垂直领导，升格为盐务局。

七、烟酒专卖公司 成立于 1951 年 10 月，原名鹿寨县烟酒专卖处。工作人员有马景春、唐昌义、张远原等。经营酒类和卷烟专卖，收购私营酒厂生产的白酒，而后批发、零售。在中渡、雒容、寨沙设有专卖处。1957 年撤销交服务局设专卖股，以后交食杂站经营。

八、医药公司 1956 年 10 月成立，原名药材公司。第一任经理梁启章。贸易公司将药品经营划归该公司接收，将药材收购划归供销社接收。1961 年更名医药公司，主要经营西药、针剂、医疗器械、中成药、中药材等。公司从柳州医药站进货，供应范围包括乡镇卫生院、农村卫生所，零售药店。上世纪 80 年代划归经委领导。

九、外贸公司 1954 年以前，外贸出口商品由贸易公司经营。1955 年成立桂林外贸站鹿寨工作组。1960 年成立县外贸站，1973 年更名为鹿寨外贸公司，属商业局领导。1979 年升格为外贸局，直属柳州地区外贸局领导。第一任经理李福田。经营项目主要是收购生猪、菜牛、皮张、肠衣、沙田柚、红瓜子、药材、活蛇等野生动物，以及适合出口的农副产品，外销及出口港、澳。在雒容设有中转仓，在雒容农场、石榴河农场设有出口基地。

十、糖业烟酒公司 主要经营糖、烟、酒、副食品、杂货，即原贸易公司所经营的主要商品。成立于 1961 年，原名食品杂货站。第一副经理黄诚。后更名为副食品公司，1975 年再次更名为糖业烟酒公司。除收购土糖（黄沙糖）外，还收购鹿寨、寨沙、中渡等国营酒厂生产的白酒。主要经营柳州卷烟厂生产的香烟。1975 起收购鹿寨糖厂、雒容糖厂、雒容农场糖厂生产的白糖、赤沙糖。在本公司内及五里亭和今地交桥面旁、雒容镇设有专业糖仓，并有专用汽车队运输。白糖、赤沙糖除少数内销外，主要调往外省。当时广西缺粮，以此能为广西向中央“以糖换粮”，换取粮食指标。1973—1974 年榨季，该公司收购黄糖粉 453 吨，名列全区前茅，获自治区糖烟公司奖励一辆载重 2 吨半的南京牌汽车。1986 年—1987 年榨季，该公司收购白糖、赤沙糖 22030 吨，创利润 400 多万无，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十一、五金公司 成立于 1961 年。第一任经理张贵。经营五金、交电、化工、石油、自行车等。“四清”后划归百货公司经营。1973 年又恢复五金公司，并扩大经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

十二、石油公司 成立于 1956 年，原属桂林市公司管辖，后因业务量小，划归百货公司经营。五金公司成立后，又划归五金公司。第一任经理彭肇怀。主要经营汽油、柴油、煤油。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划归柳州市石油公司。

十三、蔬菜公司 成立于 1975 年 12 月。第一任经理赖翔。经营蔬菜、酱菜、瓜类，并在龙田路设有加工厂，在思义大队设有蔬菜基地。1978 年撤销。

十四、饮食服务公司 成立于 1958 年，原名鹿寨饭店。第一任经理马如林。主要经营饮食业。1966 年更名为饮食服务公司，经营大众食品、炒卖，后扩大为餐饮、旅店业。1987 年撤销，人员划归百货、五金、糖烟三大公司。

十五、公私合营综合店 1956 年为适应全国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而成立。开始分为百货（包括棉布）、中西药、食品杂货三个店，后成立综合店。私方经理为肖定权。1978 年按经营业务，将人员归口划入相应的公司。

十六、公私合营酱料厂 1956 年为适应全国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而成立。第一任私方厂长为温道仁。生产酱油、酱料、酱菜、豆腐乳。1971 年与食杂站糕点厂合并为食品厂。

十七、食品厂 成立于 1971 年，由原公私合营酱料厂和食杂站糕点厂合并而成，

是我县第一家商办工厂。负责人杨骥。生产酱油、糕点、饼干、机制水果糖等等。1975年按柳州行署要求，将机制水果糖的机器设备移交县经委，建立县糖果厂。食品厂原属糖业烟酒公司，1978年划归商业局领导。

十八、屯秋矿区商店 成立于1958年。自治区为开发屯秋铁矿，修铁路、建矿山。商店主要为矿区服务而建立。第一任经理温启仁。经营百货、五金、劳保用品、副食杂货等。1986年撤销。

十九、东方红造纸厂商店 1970年应洛埠东方红造纸厂（现柳江造纸厂）建设指挥部的要求而成立。负责人杨骥。经营百货、五金、棉布、副食杂货等。1974年厂方要求自办，遂将业务移交厂方，人员全部撤回县城。

二十、鹿寨县商业局 成立于1956年。第一任局长张无双。商业局成立之前，原国营公司属工商科领导。设局后，商业局即对各国营公司实行行政领导、业务指导。各国营公司的货源主要来自区、市各专业公司，主要商品按计划分配，其它商品自行采购。1958年商业局对各公司实行大合并（包括县供销社），而内部设各专业股。1961年又恢复县供销社及各专业公司。“四清”、“文革”期间，各公司分分合合，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各公司的归属才相对稳定。此时属商业局领导和管辖的国营公司有百货、五金、食品、糖业烟酒、饮食服务、食品厂等。2002年，商业局合并经贸局。

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国营商业公司收购、供应的商品，起到了保障人民生活、生活的需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除为国家提供税收外，企业所获利润全部上交区财政。国家允许政策性亏损的企业，国家财政也给予弥补。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极大丰富，国营商业公司也完成了历史任务。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原国营商业部门的退休人员由国家包养，企业内部进行了改制。

误收横茛作茛茛

● 韦健祺

1954年，我在鹿寨县贸易公司任副经理，这年秋天，我们公司与衡阳信托公司签订了30吨茛茛购销合同。

茛茛在我县的主要产地是拉沟、长田山区，龙江、黄冕、中渡、平山部分山区亦有出产，而中渡、平山产的多是横茛。原来，茛茛、横茛通称薯茛，是多年生藤本植物，地下块茎外皮为紫黑色。茛茛内肉呈棕红色，含有胶汁、单宁酸，可做染棉、麻、丝织物和渔网的染料，亦可作酿造原料，还可入药——俗称“红孩儿”。用作染料，多次涂于练熟的坯布上，再涂以含氧化铁的泥土，使胶状物变成黑色，犹如涂漆，耐日晒、水洗，色泽鲜亮，且散发水份快，质地滑而柔润凉爽，耐穿易洗，适于制作炎夏服装，广东的“点梅纱”即此特产。用于涂染渔网，则具有很好的防腐性能。而横茛则个大，内肉淡白稍黄，胶少质差，向来无人收购。

公司接了订单，立即布置下属各购销处大力收购茛茛。当时，中渡购销处负责收购的是刚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的小郭同志。小郭对土产不熟悉，误将横茛当作茛茛进行收购，而且收购的横茛运到了县里。那段时间，我被抽调到江口区搞中心工作，而公司里负责这项业务的同志也没有及时发现。恰巧，我接到县委通知，回县里开会。我回到公

司到仓库一看：400 多平方米的简易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的，可全都是横茛！

我立刻用电话与中渡收购处联系，让我更是大吃一惊——他们说，那里的还收购了几十万斤，有的一个就有二三十斤重。不论空日圩日，农民都赶来排着长队出售。我一听，觉得事态极为严重，要他们马上向当地党委汇报，立刻停止收购横茛，否则会造成国家财产更大的损失！

收购了这么多的横茛，没有销路，该怎么办啊？桂林地区贸易分公司的朱芳伟同志得知消息，来到县里一看，也发了愁。不几天，我到桂林分公司开会，张经理一见我就问：“老韦啊，你们收的是什么‘茛’？还有仓库吗？”我苦笑着说：“是横茛，仓库都装满了。”他不再开玩笑，一本正经地问：“有销路吗？”我答：“目前还没销路，慢慢找吧！”

在桂林开会期间，我坐立不安，一直在想：这么多横茛，如何销出去呢？派人出去吗？情况不熟，差旅费用大；不推销出去，这损失可不是闹着玩的——单是付给向银行的贷款利息就相当沉重。为这事，我几乎愁白了头。为了挽回经济损失，我决定“死马当活马医”，试它一试……

散会后，我回到县里，马上叫公司的丁宪文同志找来锯子，用木板做了 15 个样品小包装箱。我拿着中国地图，查看广东、福建、浙江、湖北等省，继而把目光聚集在青岛、秦皇岛、长沙、海南岛……决定向一些沿海沿湖的市、县信托公司寄去样品作推销，以保本微利为销价，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半个月后，果见成效。陆续有温州、咸宁、舟山、青岛等地的信托公司复函要货。不到两个月，仓库里的横茛存货全部销光！衡阳信托公司派人来采购，都没货呢！

虽然转忧为喜，化险为夷，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我们可不敢再继续再收购横茛了。这次事故，教训是深刻的。搞商业贸易工作，不仅要摸清产销情况，还必须知晓商（产）品特点，精通业务，否则将会铸成大错！

教老学的六平村私塾

●李宝璜

1959 年冬，城关公社大河大队六平村 60 多岁的韦振龙，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私塾学堂”。当地人把“私塾”叫“老学”（壮语：意即学古文），去读“老学”的人叫“伦汉”（壮语：意即学生），而教“老学”的称为“生选”（壮语：意即先生）。

那时，村子里没有学校，大队只办初级小学。娃仔们读完三、四年级就辍学了，家长们只好把他们送去读“老学”。当年，韦振龙的私塾学堂招收了附近村子的 20 多名学生，分低、高两个“学等”（年级）。就读低“学等”的是本村和距本村较近的少儿，就读高“学等”的是 10 多岁的小青年。私塾学堂只收男“伦汉”，住在“生选”家。

私塾学堂以每季度为 1 个学段，一年 4 个学段，随时可以插班就读。每个“伦汉”每学段交给“生选”10 至 15 斤干谷子，也可以交“半挑红薯半挑芋”（约 50 斤红薯或芋头），算是学费。

私塾学堂以背读书写古文、吟诵诗词、赋诗作对、写毛笔字为主，间或学打加减乘

除算盘。

低“学等”的主要课程是《三字经》、《传家宝》、《全家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勤俭立身之本，耕读保家之基”，“一年只望一春，一日只望早晨”……先生教一句，学生读一句，然后抄写在作业本上，并规定一律用毛笔以正楷字从右至左竖行书写。作业本则是先生用棉纱纸裁剪成长条形装订的小簿子。先生批改作业，不打分，不批注，只在字行的右上角画红圆圈，圆圈越多，表示作业成绩越好。

高“学等”的课程主要是《幼学琼林·白话注解》一至四卷，每学段读一卷，一年内读完四卷。其中一、二卷的内容主要是天工开物，日月星辰。如：“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则上为天，气之浊则下为地。”这是卷一开首对天地形成的描述。卷三、卷四的内容主要是地生万物，人伦孝道，君臣父子，三从四德。又如：“鸦之反哺，羊之跪乳”，“地之物种，人乃万灵”，讲述做人要有道德，知恩图报……读《幼学琼林》，不但要理解其中含义，还要熟读熟背，讲究抑扬顿挫。同时，还兼学《劝学》，诸如“家有黄金千万两，不如拜师上学堂。黄金有价书无价，书比黄金价更强”之类，劝告人们要努力读书。此外，先生还教学生赋诗作对，掌握五言、七言旧体诗的格律、平仄、音韵。逢年过节、遇上红白喜事，先生还让学生为当地群众写对联。

到1964年秋，共有近百人在韦振龙的私塾学堂里读过书。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当了干部和公、民办教师。1965年春，搞“四清运动”，工作队进村，认为私塾学堂传播旧思想、旧文化而被取缔，从此停办。

垦荒移民

●杨 骥

远在清末民初之时，今鹿寨县导江乡沿柳江河而下的大步屯、相思屯、导江街、小河屯、上龙屯，属汉民族居住的村庄；其余远离柳江河的地带，如长洞村、黄泥村、佛子村、温村，包括于1953年划给象州县的雷安村、瓦洞村，多属壮民族居住的村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些汉、壮村庄交接的一些地方，逐渐迁来了垦荒的移民。1950年到1953年期间，我曾在七区（即导江区）的江口、导江、运江三乡工作，参加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在导江乡曾与这些垦荒移民多有接触，并置身于一些移民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桐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国际市场有很好的销路，故由国家管制。那时，导江乡有许多未开垦的荒山，适宜种植桐子树、油茶树。一些国民党退役军官和外来地主看中了这些地方，向省政府申请注册，到此垦荒，在导江至长洞一带的高山深谷，包括大步、相思、龙坪、聋山、龙母、鸟兰、黄泥等村屯的交界处，画界圈地，种植桐子、茶子。当时，这些人成立了桂兴、广梧、广益、广生、广成等垦植公司，随即到人多地少的平南、桂平等县招收垦民。

初时，招来的垦民并不多，来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真正无地的农民，二是逃避兵役的人，三是逃避官司的人。他们大多携家带口，翻过大瑶山，长途跋涉，来到垦区。看到这里确实有地可种，尚可生存，便再邀亲戚朋友前来。这些垦植公司招收的移民，

少的有10多户，多的有20来户，有的还分散居住在牛栏冲、老虎头、龙口、机石山等地。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木薯、玉米、红薯、大薯、芋头等杂粮；住的是寮棚，用竹子、芭芒围起作墙，用茅草盖顶，睡的也是用竹子、芭芒编织的床。这些移民，大多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当地人称他们居住的这些地方叫“山厂”。

垦民与公司老板的雇佣关系，大致订有两种“协议”——

第一种：垦民挖山地一亩，并种上桐子树、油茶树，归老板所有，三年内公司给少量报酬；垦民可在这些开垦的地里套种农作物，如花生、红薯、木薯、芋头等。第四年，桐、茶树长大成林，公司不再允许在这些地里种植农作物，垦民则要另行择地开垦，再种上桐、茶树后，方可套种其它农作物，如此周而复始。

第二种：在公司指定的范围内，垦民可以自己开荒、自己种植，收成归自己所有，但每年需向公司缴纳租金，每亩地缴纳的租金大约折合稻谷100斤。

对这两种“协议”，垦民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必须每年给老板再出一些义务工，如收摘桐籽、茶籽，运到油坊加工成桐油、茶油，外运出口。

桂兴公司的老板叫黄聘珍。此人当时40多岁，头戴礼帽，身穿呢子大衣，内套长袍，一副绅士派头。土改时被划为地主，被枪毙。广梧公司的老板叫黄顺仁。此人做过国民党的督察官，土匪暴乱时任匪团长，剿匪后下落不明。

垦民在土改时，也参与分田分地。壮族村庄的边远田地，因靠近“山厂”，就近分给他们。几十年来，这些移民在导江乡的土地上扎根定居，繁衍子孙，融入了当地社会。

如今的导江乡成为鹿寨县重要的茶油产区，油茶种植已成为导江乡的支柱产业之一，当年的垦荒移民，曾为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群文新篇◆

鹿寨县首届“三月三”民歌节追忆

●李锦华

三月涌春潮，歌海漫千峰。喜观四十八弄，香桥玉玲珑。新辟旅游胜地，宛若桃源洞府，鲁班隐仙踪。贤者为世出，灵壑此心同。

夜幕降，华灯上，礼花红。万人轻歌曼舞，昇平兆年丰。可餐大野秀色，品尝壮家香糯，五色情趣浓。故乡思奋发，侪辈振雄风。

——水调歌头：《香桥岩“三月三”歌节》

上面这阕词，是我于1985年4月所作，26年后重读，颇有感触。当年，由县文化馆发起并报请县文化局、县政府批准，各乡镇文化站及县直各文化单位热情参与，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赞助，在香桥岩风景区成功地举办了鹿寨县首届“三月三”民歌节。歌节气氛热烈，内容丰富，盛况空前。近6万群众的到来，使得香桥岩风景区声名鹊起，也促使鹿寨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源远流长唱不休。

当时，我任鹿寨县文化馆馆长、县政协常委，被推举为首届“三月三”歌节的指挥长。能亲自参与策划组织这一盛大的群众文化活动，乃是我平生一件幸事。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我区壮、苗、侗等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民间山歌手大展歌

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的时候。鹿寨是山歌之乡，当时曾涌现出如龙奶、姚世姣、陶爱英、温凤儒等一大批山歌手，在全区小有名气。由我县作家黎耘搜集整理的陶爱英山歌“旧社会妇女苦连连 / 好比石板压笋尖 / 毛主席掀开黑石板 / 翠竹顶起半边天”等“赋、比、兴”造诣较高的作品，唱响广西，并收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可见当年鹿寨的民歌创作、普及已初具规模。加上县文化馆已成功地建成了县城文化中心（今县总工会大院），除每天开展游园、溜冰、舞会、展览、彩调等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外，每周还举行小型山歌会，吸引了许多热爱山歌的观众。我曾陪同誉为广西“山歌王”的诗人黄勇刹（彩调剧《刘三姐》的编剧之一）、柯炽、古笛一起在我县采风，走访了这些民间歌手，诗人们对我县群众的山歌活动赞赏有加。为了壮大这一成果，在1985年春节后文化馆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在当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举办全县首届民歌节，地址选在中渡镇香桥岩。

为什么选址于离县城30公里外的香桥岩举办歌节呢？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桥岩宛如藏在深闺的美貌少女，尚未揭开神秘的面纱。热心于文化的原县人武部部长李振国同志向县政府提出开发香桥岩风景区获批准后，因财政乏力而导致该项目的建设被拖延；随后由李部长牵头，组织文化、糖烟公司、新华书店、供电等部门共10多个单位集资30万元进行前期开发，并成立了董事会及香桥旅行社负责管理。于是香桥岩、青狮岩同时开工（后因资金不足，青狮岩停工，只集中力量开发香桥岩）。征地、拉设电路、割除杂草、平整场地，把一条“文革”时期利民化工厂（三线军工，后撤销）取沙的尘封小路拓宽，同时建设洞口迴廊、凉亭、游客接待室等设施，经过近一年的施工，风景区已见雏形。我还亲赴南宁请著名画家黄独峰、阳太阳先生提写了岩名，镌刻于石壁之上，以提高知名度。由于初时投入少，设施简陋，宣传力度不大，游人稀少，香桥旅行社的员工只好做些其它生意维持开支，其后负债累累，导致经济官司缠身。1984年县政府下文把香桥旅行社拨归文化馆管理。如何收拾好这个烂摊子，把香桥岩名声打响，这是文化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认为：以香桥风景区为平台，在那里举办“三月三”歌节，既开展了群众文化活动，又能使游客领略香桥风景的美丽，把香桥岩隆重推介出去。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何乐不为！方案拟定后，我们及时打报告向上级文化部门及县政府阐明了意图，很快得到了批准。常务副县长吴狄同志和主管文化的副县长刘月珍同志指示：活动方案很好，经费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我作为政协常委，也及时向政协主席谢仲同志作了汇报，并得到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1985年4月22日，就是农历乙丑年三月初三了。在只有20多天的时间里为筹办好我县首届歌节，对相关人员进行分工，成立了5个小组。

〈一〉旅游接待组：由文化馆副馆长陈昌联、香桥旅行社经理陈世岗负责。印制5万张入场券、平整停车场、安装饮用水管、安排餐饮点、开通从香桥岩内出水口处搭便桥接通对岸游客回程道路（当时九龙洞及观景亭的回环道路还未建）。

〈二〉宣传舆论组：由我与谷向阳同志负责。在《柳州日报》、《鹿寨报》上连续刊登由我绘制的歌节活动宣传画广告（当时还没有电脑制作）；县广播站每天进行广播（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县文化馆及县总工会门前（今县文化广场）悬挂大幅歌节宣传画；各乡镇文化站都打出宣传广告标语；由县文联副秘书长黎耘负责编印一期《鹿寨文艺》（报纸版），介绍“三月三”歌节的来历，刊登优秀山歌；发邀请函请柳州地区各县及柳州市、桂林市、永福、荔浦等地的山歌手到现场摆歌台。地区文化局陆炳兰局长对该项工作极为重视，亲自向各县文化局打了招呼，敦促地区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三〉经费筹集组，由文化馆全馆干部负责，吴狄、李振国同志亲自出面指导。文

文化馆从县文化中心收入中先借垫少量资金，在县糖烟公司餐厅宴请县里知名度较高的个体户老板们，糖烟公司经理刘忠荣赞助茅台酒（当时才9元多一瓶）助兴。当老板们得知要在香桥举办“三月三”歌节时，气氛活跃，纷纷解囊，300、500、1000、2000，席间筹得现金3万多元。令人感动的是有些老板事前不知，听闻后也踊跃赞助，如个体户韦桥初先生，亲自到文化馆交了3000元；鹿鸣村的覃先生喜爱绘画，也为歌节举办的画展赞助1000元。

〈四〉活动安排组，由文化馆文艺辅导干部莫显木、李宏杰等同志负责。12个乡镇文化站长带领本乡镇的10多名山歌手组成的山歌队，打着横幅设立了12个山歌台；还搭建了2个戏台，分别由县文工团及文化馆桂剧团（此团为当时文化馆业余文艺辅导队骨干从各乡镇招收演员组建，自负盈亏）、城镇彩调团白天黑夜连场演出民间歌舞、彩调《王三打鸟》、《隔河看亲》、《牡三求婚》等剧目。歌节期间，还举办美术、书法、摄影展览，由文化馆副馆长朱剑明、文管所所长刘昌隆负责。晚上电影连场放映《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等影片，由电影公司负责；两台录像机放映十几个香港功夫片，（那时录像可是新鲜货哟！）由莫显木、江小田负责。焰火晚会则由文化局蔡琛负责。糖烟公司、百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负责举办物资交流会。计划“三月三”当天通宵达旦开展活动。

〈五〉后勤保障组，由本馆财务人员及香桥旅行社蔡小小、廖安雄同志负责。发放歌手补助、计划项目开支，准备嘉宾的午餐、晚餐，到梧州购买香肠并用民间传统染色工艺制作五色糯米饭。

首届“三月三”歌节由县武装部长李振国、县常务副县长吴狄同志任歌节顾问。各组明确了工作职责，分工不分家，大家同心协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三”的头两天，吴狄副县长在响水铁矿现场办公时，听取了我和副馆长的汇报，叮嘱我们要考虑到天气、交通、安全、电力等因素，作好应变措施；并要求中渡镇政府、县公安局负责落实歌节期间的交通安全和治安事宜。李部长还主动跟屯秋海军部队联系，借来了发电车作备用。

4月21日（农历三月初二），李部长率领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提前一天到达香桥岩，进一步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确认一切工作保障完善无误，大家才略舒了一口气。但我们仍不敢懈怠，昼夜保持着工作状态。当时虽是阳春三月，山野的夜晚却还是寒冷刺骨（工作人员御寒的棉衣被褥是从武装部紧急调用的），我们围坐在篝火边，毫无睡意。

精明的商贩也早已就位，场地所设摊点琳琅满目，如米粉、小吃、糖烟、小百货等，桂林、柳州及周边县分游客自备帐篷提前赶来，广东老板开设了桌球点，还现场展览来自平南的奇异的双头牛……“戏”未开唱，但已热闹非凡。

4月22日（农历三月初三），天公作美，阳光灿烂。上午8时赶早到达的游客已有数千人，他们惊叹香桥的雄伟灵秀，嬉戏于青山绿水之间，惊诧鹿寨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上午10时，5万张入场卷已经售罄，我们只好免票放行。香桥场外又传来讯息，从英山中学到香桥数公里的路上，人流车流还在不断涌来。人满为患，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香桥岩风景区内，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上午11时，吴狄副县长宣布“鹿寨县首届‘三月三’歌节开幕”，醒狮舞动、鞭炮齐鸣，12个山歌台同时唱响了山歌。身着瑶族服饰的黄冕文化站站长黄宣贵和他所率的山歌手格外引人注目，平山文化站长陶少哲所率领的平山歌手也穿着壮族节日盛装唱出原生态风味，主歌台上是柳城县的男女歌手与我县精选出的歌手对垒摆擂。一时间，山歌声此起彼伏，你来我往的盘歌和风趣善意的刁难，引得台下发出阵阵笑声。人们游山玩水，看戏听歌，惊叹香桥岩的

魅力，感受传统节日的快乐，“三月三”的热烈气氛在中午已经进入了高潮。

然而，百密难免一疏，因香桥岩进口小，人流拥挤，群众把从香泉抽水的水管踩断了，一时歌场内陷于无水供应状态，数万人顶着阳光口干舌燥，摊点上的瓶装水也被抢售一空，机灵的附近村民用木桶担来的井水竟卖到了一元一碗，抢得了商机。同时，后勤供应的“五色”糯米饭因在中渡镇制作，运输的卡车在路上被堵，迟迟未到，也把我们急坏了，所幸后来警察疏通道路，才保证这辆车终于进场。

入夜，华灯初上，人们品尝了壮家五色糯米饭及自带的食品后，吃饱喝足，精神焕发，又一次把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电影中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的歌声回荡在香桥的夜空，“哪咿哟，哟咿哪”的彩调和锣鼓声震荡着山谷，引来声声回响；五彩的焰火礼花腾空绽放，照亮了游客的笑脸；缠绵的情歌牵动着青年男女的心灵，不少人自发地在山上也摆起了歌台……直到次日凌晨，当主会场的高音喇叭响起“香桥岩‘三月三’歌节到此结束，请游客们有序地退场”的指令时，很多群众才依依不舍或步行或驱车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原定是通宵达旦的活动，但我们担心深夜人多，而且传闻还有许多群众继续赶来，生怕会出现不安全因素，吴狄副县长指示歌节要提前结束。）这不能不说是这届歌节最大的遗憾！

歌节结束几天以后，我们根据群众的反响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歌节是办得成功的，（1）香桥岩的名声从此打响；（2）鹿寨的山歌及群众文化活动得以推广普及；（3）没有出现交通事故及人员伤亡。至于出现饮水困难、交通堵塞等问题，也给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

如今，时过境迁，80后的人已不知鹿寨县曾于26年前举办过这么盛大的文化活动，但那些年长的参与者还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而今，香桥岩风景区由从县文化馆管理到县城建局管理，再到县旅游局管理，已有了长足发展，建成了4A级风景区和国家地质公园。通往香桥景区的公路已拓宽建成标准的二级公路，同时中渡古镇也进行了规划和修缮，还建设了鹿园、猎园、农业种植示范园等，今后香桥岩景区将是集自然、文化、古迹、农业的旅游观光景区。2007年，鹿寨的平山山歌申报并批准成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09年经自治区文化厅、柳州市文化局推荐，参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谨以此文，祝愿香桥岩的明天更加秀丽，祝愿源远流长的鹿寨山歌如洛清江之水代代流传！

历时 41 天的鹿寨县首届戏曲表演大赛

●李宝璜

上世纪80年代，我县群众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90年，文化馆登记在册的业余文艺团（队）有140多个，业余演员3200多人，仅城关乡活动正常的业余文艺队就有50多个。

为了巩固和发展业余文艺队伍，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由鹿寨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的鹿寨县首届戏曲表演大赛，于1990年12月11日至1991年1月

19日在县城文化中心（即今县总工会所在地）举行。大赛的主题是：“振兴地方戏曲，弘扬民族文化。”

大赛组委会由下列成员组成：主任黎耘（县文化馆馆长）；副主任廖学敏（县文联秘书长）、梁志明（县文工团团长）、李宝璜（县文化馆副馆长）；工作人员有朱剑明（县文物管理所）、李代荣、邓玉洁（文化馆文艺辅导员）、梁庆坤、李全林、谭亦基（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乡镇文化站站长吴永才、肖公言、朱芳信、张发军、黄宣贵、吴声涛、黄宣祥、江日生、罗日旦、张辉、江小田为各乡镇代表队领队。

组委会下设演出组、评委组、后勤组、治安组。演出组主要负责节目安排和舞台灯光、音响、道具。评委组主要是对演出的剧本内容及表导演以打分的形式进行评判，并对演出队进行讲评。后勤组主要负责演出队的食宿安排。治安组负责维护演出场地的秩序以及演出队往返的安全问题。

大赛设立的奖项有：演出一等奖1名，奖金300元；演出二等奖2名，奖金各200元；演出三等奖6名，奖金各100元；导演奖10名，奖给证书1本，保温杯1个；优秀演员奖120名，奖给证书1本，保温杯1个；风格奖2名，奖给锦旗1面；参加演出的文艺队均获“艺苑奖”锦旗一面。另外，还设立文明、热心观众奖。

大赛前，文化馆组织了舞龙、舞狮队及宣传彩车，在县城广泛宣传，大造声势；同时，向各乡镇文化站发出通知，采取“自愿报名，文化站推荐，文化馆审定”的办法，在全县挑选了41支业余文艺队参赛。他们是——

四排乡：南村彩调团、川岩村彩调团、金贵村彩调团、三排村彩调团、寨兴村彩调团、马村彩调团、欧阳村彩调团、鹅颈村彩调团、六午村彩调团、桥旦村彩调团、建村彩调团、平地村彩调团、四排街桂剧团。

城关乡：木翠村彩调团、公相村彩调团、上龙村彩调团。寨头村彩调团、马傲村彩调团、思贤村彩调团、屯连村彩调团、前进村彩调团、达梯村彩调团、石龙村彩调团。

寨沙镇：北大部村彩调团、南大部村彩调团、根湖村彩调团、木岗村彩调团、头社村彩调团。

导江乡：龙坪村彩调团、黄坭村彩调团、浪村彩调团、石苟村彩调团。

鹿寨镇：鹿寨镇彩调团、个体协会京剧团、鹿寨镇桂剧团。

龙江乡：长塘村彩调团、板坡村彩调团。

拉沟乡：个体协会彩调团、甫上村彩调团。

黄冕乡：三里村彩调团。

中渡镇：黄腊村彩调团。

演出的节目和场次按各乡镇文化站长抽签的结果依顺序排列。41天共演出52个节目，其中现代节目13个，如彩调剧《相亲》、《风云的婚事》、《亲家认错》、《林海青春》等。这些节目大力讴歌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时代风貌。传统古装剧目39个，有不少是大型剧目。其中京剧1个，《苏三起解》；桂剧《生死牌》、《十五贯》等。彩调36个，如《花田错》、《访贤记》、《隔河看亲》、《王麻抢亲》、《寒窑成亲》、《秦香莲》、《窦娥冤》、《赶子牧羊》、《悬崖惊梦》、《庙郎》、《双玉婵》、《磨合乐》、《柜中缘》、《豆汁记》、《刘玉选婿》等。这些传统剧目着眼于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其中一部分由本地的民间艺人根据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导演。一部分为自己创作，如《访贤记》、《生死牌》等。参加这次演出的1200多名演员，年纪最大的84岁，最小的12岁。鹿寨镇京剧团演出的京剧《苏三起解》，开台戏由时年84岁高龄的该团演员、我县著名画家、全国京剧票友潘文经老先生演唱。一些文艺队，出现了父子、母女、兄弟、

姐妹、夫妻同台演出，有的女演员背着嫩仔来参加会演。

大赛开幕式的当晚，由四排乡南村彩调团进行首场演出，节目是传统彩调《寻儿记》。县城文化中心能容纳近 1000 人的室内简易剧场，观众爆满，许多人没有座位，站在过道直看到演出结束。

尔后，各文艺队按组委会安排的顺序依次演出，演出结束的文艺队第二天上午集中在剧场，由黎耘馆长带领评委会成员召开演员座谈会，对剧本和表导演进行讲评，还由文化馆文艺辅导员和特邀的一些老艺人师傅传授表演技能。每天中午，完成演出的文艺队离开剧场，由另一支文艺队报到演出，以此循环，历时 41 天，共演出 41 台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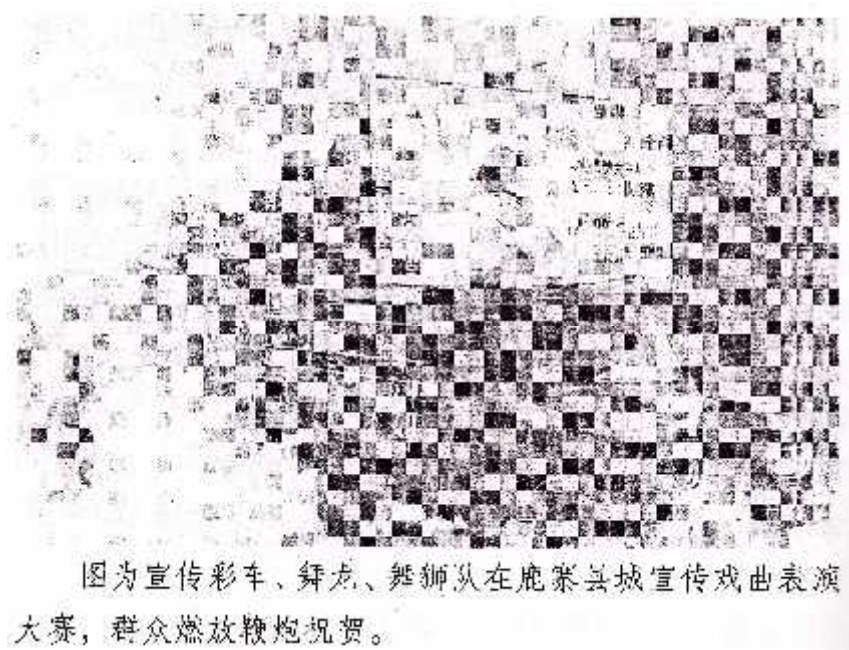
戏曲表演大赛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据统计，共有 5 万多人次观看演出。县城不少戏迷订月票观看。附近农村的农民如黄班、鹿鸣、思贤等村的群众，或步行或坐单车成群结队地赶来。远道而来的一些观众，住在熟人家里，一连看了好几场戏。每场演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与剧场一墙之隔的是鹿寨镇敬老院，住着 10 多位“五保”老人，其中张满娘和张伯夫妇是戏迷，逢演必看，每个晚上从家里拿来 10 多张木凳到剧场给没有座位的观众看戏。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邓树生，几乎场场观看，被评为“热心观众”。

参演的文艺队没有任何补助，食宿、交通等费用和铺盖自理。组委会后勤组在文化中心开设了男女演员分别住宿的两个大房间，床铺是用禾稿在地上铺成的大平铺。后勤组设了一个专供煮饭、烧热水的厨房。各文艺队自己带米、带菜、带柴火和餐具自行开伙。城关乡木翠村彩调团来自边远乡村，演出的头一天，生产队安排手扶拖拉机手把大米、柴火运到演出地点。还托在县城工作的亲戚好友用大米兑换了面条给演员演出结束后煮夜宵。第二天，演员们背着行李，挑着乐器、道具，步行 40 多华里到文化中心演出。参加演出的达梯村彩调团则由文艺队长周善标组织了 6 人单车队，用单车运柴、米、油、盐、蔬菜，演员们步行 30 多里路来到县城。拉沟乡个体协会彩调团 20 多名演员，在队长黄德欢的带领下，打起红旗来到县城，从建中路敲锣打鼓进入文化中心。鹿寨镇京剧团演出的当天，镇个体协会组织的龙、狮队一路劲舞，鞭炮齐鸣，把演员送到剧场。大赛期间，曾遇到天冷，下大雨，但参演队克服种种困难，保证演出不误场、不缺场。

41 个晚上的表演，经评委评判打分，四排乡桂剧团演出的桂剧《生死牌》获演出一等奖，四排乡三排村彩调团演出的《访贤记》、城关乡公相彩调团演出的《庙郎》获二等奖，鹿寨镇桂剧团、寨头村彩调团、金贵村彩调团、龙平村彩调团、木岗村彩调团、头社村彩调团获演出三等奖，屯连彩调团、寨兴彩调团获演出风格奖。韦金声、覃电忠、林立等 10 名老艺人获优秀导演奖；刘吉安、莫凤龙等 120 名演员获优秀演员奖。

大赛期间，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柳州地区文化局的领导多次到现场观看、指导，柳州地区群众艺术馆还组织三江、柳城、柳江等县文化部门的人员前来观摩学习。闭幕式当天，县文化局、县委宣传部、地区文化局、自治区文化厅的领导亲临现场，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鹿寨县首届戏曲表演大赛，其声势之大、历时之长、演员之多，超过了我县历届的文艺会演，有力地推动了我县群众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1991 年 12 月，全县业余文化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新成立了近 20 个队，城关乡、寨沙镇、四排乡、导江乡还先后举办了“法制文艺会演”和“春节文艺会演”。



图为宣传彩车、舞龙、舞狮队在鹿寨县城宣传戏曲表演大赛，群众燃放鞭炮祝贺。

◆ 古迹觅踪 ◆

里定古驿道

● 黄学德 丁跃强 / 口述
朱芳信 朱明惠 / 采录、整理

里定是鹿寨县黄冕乡最北边的一个村屯，与永福县兰麻村互为两县交界之地。里定屯背靠金鸡岭，前临洛清江。在湘桂铁路及桂柳高速公路未开通前的 1400 多年，这里一直是桂林通往柳州的水陆交通要道。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登基后即在此设治定县。武德四年，宣风县并入治定县，改称为理定县，县治设在金石镇（今理定村）。宋代县治迁清音，元朝迁权唐，明初又迁回里定。今之鹿寨、龙江、寨沙、黄冕等地域，当时均属其管辖。里定县唐、宋时，属桂林府，明庆隆五年改归永宁州，明正统五年废县设堡划归永福。理定县建县前后共历经 829 年，后由县降格为堡、镇、乡、村、屯。

整个桂柳驿道以兰麻至里定这一段山道最为艰险难行，所以当地民谚云：“兰麻，里定，好人走出病。”这里四周群山连绵，拔地擎天，坡陡路窄。如遇雨天，行走此道，几乎需手足并用爬行，苦不堪言。当年大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柳州途经此地，曾有“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兰麻高”的诗句，即是里定古驿道真实的写照。因这一带山高林密，险峻异常，且洞穴星罗棋布，故合适绿林好汉或山匪盗贼安营扎寨，聚啸出没。这一带建有龙凤寨、竹叶寨、竹山寨、孟良寨、福建寨、三里寨等大小山寨 10 多处。

唐武德四年，为疏导交通，开发岭南这片蛮荒之地，李渊下旨动用大量人力财力，

在这一线开山劈岭，修筑官马大道。驿道路面依山势而筑，多为梯级道路，每级长 15 丈，宽 3 尺，路面多为取自河滩的鹅卵石镶拼而成。在里定城东和城西，各建有一座单拱“迎龙桥”。明嘉靖二十二年，为加强防卫，知县在土城墙内又兴建一道砖古城墙。由于修筑了驿道，改善了交通，大大方便了官人坐轿骑马、商旅贩夫徒步行走。为迅速传递官府文书，唐时设立了洛容和里定两驿站，配备正马及贻牛各 15 匹。明代增设大汾塘和旧街驿，清朝又增设三门江、崖头、新村和牛摆堡等驿站。这一带还有拦马关、汉河关等险关要隘 8 处，这些关卡要隘平时可收关税，战时既可阻挡外部入侵，又可防止“反贼”冲杀而出。每当大战暴发，官府必派重兵前来防守，以保地方和商旅平安。

女皇武则天执政时，不但唐朝的政权更加牢固，且府库更为丰盈充足。为了进一步加强广西的开发和控制，她于长寿元年下旨开挖桂柳运河。此渠又叫南陡运河，全长 30 华里，主体工程的相思埭河道大部分在临桂县，其余在永福县，这条人工运河称“唐渠”，因工程与作用可与秦渠相媲美，故称：“北有灵渠，南有陡河。”相思埭分相思河水为二，一水东流接漓江，一水西下通洛清江。从此柳江、洛清江与漓江、长江连成一线。里定古驿道与南陡运河的开通，使里定这个中转站空前热闹。

旧时的里定城，县前洛清江两岸古木参天，江水碧绿；城后金鸡岭山峦叠障，景色秀美；城南鸡罩山山形奇特，如倒置的鸡罩；城内街头街尾有雷王庙、盘古庙、龙王庙等寺庙，每天暮鼓晨钟，木鱼声、颂经声声入耳，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到此览游。曾在桂林做过 3 年观察判官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于大中元年趁闲暇之时专程到里定一游，时值当地庙会，写下了一篇《赛古榄山祠神文》流传后世。

这条古驿道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运兵运粮食，巩固南疆。北宋仁宗时，政治腐败，壮族农民领袖侬智高在南宁揭竿而起，领兵北上攻下柳州，朝廷震惊。相传，朝廷派杨文广为广西柳州路兵马铃辖，沿这条驿道前来征剿。谁知杨文广被起义军困在柳州驾鹤山，连连告急。杨八姐赶忙率领 10 万大军又沿着这条驿道前来急救。当前锋在旧街渡过清江时，因人多船小十分缓慢，大队官兵只好在离河边不远的山村安营扎寨等待。军营中每天早上鼓号齐鸣，震天动地，于是，旧街旁的这个村庄改名“大鸣”，后演变为“大明”。运粮草军需物资的马队驻扎在后边的村寨，一时间战马如云，后来人们将此村叫做“马村”；在壮语中，“马”、“麻”同声，经演变后，叫做“麻村”。

这条古驿道在鹿寨境内第一次改道是在明朝万历初年，当时的老路是在旧街渡洛江后一直走旱路经长盛、东泉到柳州。自从古田起义军的余部在托定和洛斗两地再度起义后，其声势把知县邵延臣吓得躲在柳州不敢回衙，由主簿谢漳代行职务。起义军攻破洛容县城米洞后，主簿被斩，全城被大火焚毁，当局只好将县城迁到灵塘另立新的县城。与此同时，已逐渐形成了繁华的圩市。

与此同时，鹿寨也逐渐形成热闹的圩市。为方便往来客商行走，柳州府在三门江设立官渡，新建立的洛容县，也在县城旁和大汾塘设立官渡，解决了“隔河千里”的困难。商旅从此不再走以前的驿道而改走江南的新路了，因为此道既平坦宽阔，比老路爬山越岭好走了许多，还缩短了行程。

自从民国二十七年修筑了湘桂铁路，以及后来的 323 国道从桂林经荔浦、榴江、鹿寨至柳州后。理定城不再在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上，这座昔日的古县城很快就衰败下来。而今，城里残存的一些老旧房屋、城西的“迎龙桥”以及断断续续的古驿道，还在见证着一段古老的历史。

中渡城隍庙

●黄小斌

“城”，本义是土筑的高墙。高墙之外，再挖深沟，有水者为“池”，无水的壕沟便是“隍”。城与隍，构成了冷兵器时代官府与黎民百姓最安全的保护屏障。因此，远在孔夫子时代，每逢除夕，人们都要极隆重地“腊祭八神”。八神中，第七神为水庸，即城隍——因为水即隍，庸即城。

城隍庙按现在人的说法是“山寨法院”，要为人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城隍庙是大剧院，演绎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的悲欢离合，娱乐民众，教化群氓；城隍庙还是穷人的最后避难所，无家可归的落难者，可以侥幸讨得一餐，求得一宿；城隍庙也像教堂，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官场里的荣辱沉浮，生意上的盈亏赔赚，都可以在这里期冀庇佑和找到安慰。在中国古代，不仅新官上任要到城隍爷面前宣誓就职，甚至，就连刑场监斩官行刑结束之后，也一定要绕道城隍庙烧炷香，让城隍爷拿下可能跟在身后的冤魂。城隍庙曾经是先人们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无法绕开的地方。

在距离鹿寨县中渡镇旧县村右侧0.5公里处的山坡凹地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处明末清初时期留下的城隍庙遗址，也遗留下清朝光绪皇帝赐予“城隍爷”的牌匾。该城隍庙庙址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为上三下三户型，砖木结构，典型的岭南式建筑风格；其牌匾刻有玉玺龙头，四边为卷云纹装饰，长近2.2米，宽1米左右，重约50公斤。

传说清光绪年间，京城太和殿失火，鹰山城隍爷不畏辛劳，远赴京城救火。光绪皇帝念参与救火者有功，便论功行赏。最后轮到鹰山城隍爷叩领时，皇帝问道：“来自何处？”城隍爷答：“岭南鹰山。”光绪皇帝沉思片刻，心想：这岭南地方，天宽地广，何处是鹰山？即问大臣：“鹰山所在何处？”大臣们一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便找来地图细细览察，可仍然没有找到。说来也巧，真个是应了“无巧不成书”这句老话——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两个灯笼，灯笼上映现出“鹰山不二”四字；更巧的是，地图上一处地方也顿时出现了这四个字——乃属岭南洛容县所辖。光绪皇帝见鹰山城隍不远万里赶来救火，龙心大悦，当即挥动御笔，题写了“膏泽芘荫”四个大字，勉励其造福黎民，庇佑百姓。其后，由工匠刻成牌匾，御赐中渡城隍。再后来，城隍爷将此匾悬挂于城隍庙前门上方。耸立于城隍庙附近的鹰山（一名凤凰山）上的摩崖大字“鹰山不二”，即缘此而来。

此匾现保存于鹿寨县文物管理所。但由于历史原因，在“文革”期间，我县唯一的中渡城隍庙也难免遭遇厄运，庙里的砖瓦桁条被拆来作维修英山中学之用，光绪皇帝所赐的匾上“膏泽芘荫”四字，也被铲去了前面二字。这些遗迹和遗物的存在，对于研究和考证我县明清时代的历史、民间民俗文化有着极高的价值。

寨沙镇柳能屯清代拔贡牌匾及对联

●刘江平

早就听说柳能屯有一块已逾百年的清代“拔贡”牌匾及对联，一直都在探寻。最近，与友人在村民的热情帮助下，总算“水落石出”，得以观瞻，如愿以偿了！

这块“拔贡”牌匾及一副对联，至今仍悬挂于鹿寨县寨沙镇教化村民委柳能屯林家祠堂。（如图）由于年代久远，牌匾及对联已显斑驳，颜色已大面积剥落。

“拔贡”牌匾为一块樟木雕刻而成，横式，长129cm，宽55cm，厚3.2cm。匾上共雕刻有30个字，正中为遒劲的楷书“拔贡”二字，上首竖排小字为“钦命广西郡抚部院张 提学使司李为”，下款竖排小字为“宣统元年己酉科拔贡林芾禎立”。

对联及横批匾额也是用樟木雕刻而成。

横批匾额长200cm，宽59cm，厚5cm。正中是“杖国耆英”四个大字，上首竖排的小字为“赏花翎都抚院山东道监察御史大广西提督学政加三级纪录五次刘为”，下款竖排小字为“光绪二十八年仲夏吉日旦耆民林凤秀立”。

上下联匾牌各长183cm，宽37.5cm，厚2.5cm。上联是：“三仁世泽”；下联云：“九牧家声”。

经过一番查族谱、找资料，梳理、考证，现将与牌匾和对联相关的历史背景，以及牌匾与对联中的文字试作浅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杖国”、“耆民”、“耆英”、“三仁”、“九牧”是何意思？

杖国：即国家栋梁。

耆民、耆英：为高年硕德者。

“三仁”、“九牧”：均典指林姓名人。

据典故，“三仁”乃是殷末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和卿士微子。殷商将倾，敦厚的微子屡谏不从，只好逃隐；俊智的箕子，坚持“不彰君之恶”佯狂为奴，而被纣王囚禁；忠烈的比干，强谏三日，为民请命，终被纣王剖腹摘心，为国殉难于摘星楼。周武王克殷后，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微子为求保殷商宗祀，“肉袒面缚，膝行而前以告”。周武王乃封微子于宋，保存了宗祀。孔子用“忠君爱国”和“尊贤让能”的双重标准，认为“箕子重社稷，比干笃忠贞，微子保宗祀”。

“九牧”，则典指林氏始祖林坚34代孙林皋。皋为比干子孙，战国时任赵国宰相，权倾一时，德高望重。皋生九子。受家风影响，九子各有才能，且德才兼备，时人称之为“九龙”。林皋则被称为“九龙之父”，家族亦称为“九龙门”。父子十人同以德才见称，因此被称为“十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之门”，为后来林氏祠堂号“九龙堂”和“十德堂”之始。

二、什么是“拔贡”？

“拔贡”是明清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制，初定6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12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保送入京），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三、“广西郡抚部院张”是谁？

当为张鸣岐。张鸣岐（1875—1945年），字坚白（一作健伯），号韩斋。山东无棣县段家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广西布政使，署理广西巡抚，翌年实授。官至两广总督。

四、“提学使司李”、“大广西提督学政”是谁？

当为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李翰芬，广东中山县人，光绪二十年举人，后任广西提学使。

五、林芾祯其人。

从柳能屯林家族谱得知，林芾祯是拔贡牌匾的主人。林芾祯，今鹿寨县寨沙镇教化村民委柳能屯人，字干才，号君任，又名林世祥，系林兴业之季子（小儿）。幼承父志，苦读诗书，于光绪戊戌年（1898年）入柳州府郡庠（学校）就读，见中国积弱，西势东渐，立志外出求学。光绪甲辰年（1904年）毅然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弘文学院警政科暨文科师范，第二年领凭回国。历任广西师范教习，巡警道总务科长等职。宣统己酉年（宣统元年，即1909年）考中拔贡生。公车北上，朝考二等，蒙广西巡抚奏留在桂办理警政。民国期间，历任广西灌阳、荔浦、平南、容县等县知事，后任广西银行行长。民国六年，以“时事日非，双亲垂老”为由，乃辞职迎养蛰居桂林。

据柳能屯林海洋等老人听上辈传说：中渡县有一凶悍土匪头目，连县长都拿他没有办法。为清除此匪首，上司暂时将中渡县长调离，把林芾祯调来任中渡县长。林芾祯来后，设宴邀请此匪首，匪首果然率队应邀前来。席间，林芾祯与匪首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散席后，匪首即率队离去。行至半道，林芾祯派人追上，谎称有东西相赠，劝其返回。匪首见席间彼此如此融洽，便放松了警惕，只身返回中渡。林芾祯当即指挥伏兵齐出，将其擒而杀之，为民除了一大害。后怕土匪报复，林芾祯立即骑马连夜返回桂林。

六、历经日本侵略、“文革”浩劫，牌匾、对联如何保存下来？

据柳能屯林炳义、林继生等老人说：日本侵略者曾在柳能屯烧杀掳掠，全村房屋门窗都被烧毁，因当时这林家祠堂有院子，便于保卫，日军指挥部驻扎于此，牌匾、对联才得以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地红卫兵串联来到柳能，见到牌匾、对联，认为这是“四旧”，要毁掉。当时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林炳义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东西，不要抢我们的东西。如果要动手，全村人放不过你们。”红卫兵害怕村民人多，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为了保护好牌匾、对联，村民们将其摘下藏匿，直至“文革”后才又挂了起来。

其余因资料原因，目前尚待考证。



图为悬挂于鹿寨县寨沙镇教化村民委柳能屯林家祠堂的牌匾与对联。

◆民族宗教◆

鹿寨回族清真寺的变迁

●海逢友

鹿寨镇的回民，于清朝道光之年以前就开始从湖南、桂林一带南下，迁移到这里谋生。光绪初年，镇里有回民 11 户，以后逐年增加。解放初期的 1950 年，已增至 62 户 259 人（男 127 人，女 132 人）。据 1997 年统计，鹿寨镇的回民为 743 人，全县的回民为 997 人，是我县回族人口的高峰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凡有回民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清真寺。鹿寨清真寺建于清道光九年（公元 1829 年），最早设在米行街（即现在的仁厚街），比较简陋。光绪初年（1879 年），迁建于当时鹿寨镇最繁华的十字街。正面是三开圆形拱门，顶端中间用回、汉文字书写寺名。光绪二十年（1894 年）增建经堂、大殿和厨房，增建面积约 200 多平方米。这时期整个寺院包括附属设施占地 600 多平方米。大殿宽敞明亮，可容纳 100 多教民同时做礼拜。大殿后面有个小殿，小殿之上是青砖砌的七级六角形宝塔（又称“叫拜楼”或“望月楼”）。塔高 26 米，葫芦形尖顶，每级塔檐用琉璃青瓦镶盖，肃穆壮观，庄严雄伟，于郊外 5 里之遥亦可见，是当时鹿寨镇较高且独具风格的标志性建筑，故所在街道亦以“宝塔街”冠名。

鹿寨清真寺于 1944 年遭日寇轰炸及大火焚毁。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申请获得当

时柳州救济总署一笔救济款，加上回民捐助，在原址上重建新寺。新寺包括寺殿、厢房、教室、门市，共占地 700 多平方米，规模也还可观。但因资金不足，七层宝塔再无力再建。

1946 年新寺建成后，利用富余房产开办了穆斯林回民小学。初开 2 个班级，以后发展到 6 个班级，招收回、汉各族儿童入学。回族学生另开设阿文课，学习经文。1955 年，在校学生已达 211 名。1955 年后，寺校分离，穆斯林小学由镇人民政府接管，另择校址迁建，更名为鹿寨镇第二小学。穆斯林小学首任名誉校长是章凌昌，首任校长是马自纯。1953 年由马朝文担任校长，直至 1955 年。

从光绪年间起，历任鹿寨清真寺教长（阿訇）有：杨友梅、伍万春、马运成、马云亭、马万方等（因年代久远，以上教长任职时间不详）。

历任教长还有：

李寿堂：1842—1889 年，任职 47 年。

翁云甫：1890—1913 年，任职 23 年。

马子修：1914—1944 年，任职 30 年。

白云象：1945—1956 年，任职 11 年。

马介然：1957—1962 年，任职计 6 年。

方善卿：1963—1977 年，任职 15 年。

（空缺）：1978 年—1994 年，17 年无教长。

张清智：1995—1998 年，任职 4 年。

苏平耀：2003—2010 年，任职 8 年零 6 个月。

1946 年重建新寺后，清真寺的管理设立了董事会。首任寺董事长为章凯，董事有海月舟、杨云芝、章凌昌、白东初等 5 人。解放后至 1998 年底，历任董事长为：章凯、杨云芝、陈光华、白仲谋、马自纯、海逢湘、马孤萍、陈继秋。

解放后，鹿寨镇成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大潮的掀起，县城加快了建设步伐。1978 年，进行旧城改造，扩宽街道。由于“文革”期间董事会已经瘫痪，清真寺在无组织管理的情况下由有关部门动员拆迁，搬到太和街 72 号一座旧民房。以宅地换宅地，以寺院换民房后，清真寺的寺院没有了，所有的房产也没有了。清真寺成了“三无寺院”——无寺殿、无房产收入养寺、无阿訇（寺院的主持或教长）。对拆迁遗留的问题，鹿寨回民一直强烈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重建清真寺！

1999 年，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制订的《清真寺民主管理条例》，进行换届选举，成立了第一届鹿寨清真寺管理委员会。委员有：马云瑞、马玉林、马凤仙、海均、海逢湘、海逢友、杨启光、白克英、白克武。寺管会主任为海逢友。

首届清真寺管委会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筹集资金，重建清真寺。新的寺管会克服陈旧保守的观念，解放思想，不等不靠，齐心协力，排除困难和干扰，采取“三个一点”的集资方案，争取政府和各级有关部门拨款支持一点，向全国各地回民伊协、寺管会和香港教胞求援一点，鹿寨回民捐献一点，共筹集资金 38.8 万元。重建工程全盘统筹，分阶段实施。资金陆续到位后，即进入第一期工程的施工。新建的寺楼于 1999 年 8 月动工，2000 年底落成。现在的清真寺建筑面积达 551 平方米，是一栋现代化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建筑。寺楼宽敞明亮，分为三层：底层是一个大厅堂，主要供回民进行各种民族宗教节日聚会活动之用；二层为教长阿訇食宿生活住房，以及寺管会的办公室、会议室、保管室等用房；三层为一个礼拜殿，可供 100 多教民礼拜。

2001 年开始实施第二期工程，修建寺门楼、卡布房、用于取得收入以养寺的 5 个门市、功德碑等。建筑面积达 236.7 平方米，年底全面完工。

至此，鹿寨清真寺全面重建，面貌焕然一新，圆了鹿寨回民教亲 20 年久盼的心愿！

◆人物画廊◆

林芳同志的一生

●林桎华

林芳（1921—1980 年）原名守月、中萱，中共党员，汉族，鹿寨镇角塘村（原雒容县角塘村）人，是我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且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革命之一。

1935 年前后，林芳在家乡读书时，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社会发展史》一书，对他的影响很深。升入广西省立第四中学后，直接受到进步老师特别是校长魏伯（中共柳州地下党员，建国后曾任柳州市委书记）的影响，更如暗夜中看到了光明。随着年岁日增，革命思想更为明确。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压制民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那时的陕北延安，已成为全国进步青年热烈向往的目标，林芳遂萌发了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念头。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魏校长。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需要，派李克农到广西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联络安排广西的青年学生到延安去上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为广西的将来培养干部。魏校长看到林芳意志坚决，就介绍他去桂林直接找八路军办事处。

1937 年底，林芳回家过年。他悄悄与父亲林智庭商量，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林芳家有三兄妹，上有一姐，下有一妹，他排行中间，是个独子。林智庭先时不愿意让他去，但他毕竟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见儿子去意已坚，知道拗不过儿子，后来还是同意了。他给了林芳 90 块银元，让他藏在身上，作为北上延安的路费。大年初二，17 岁的林芳与鹿寨街的几个同学，还有龙田村富家出身的林××、李××等人离开了家乡，到了桂林。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秘密安排，他们一路辗转奔赴延安。路途跋涉的艰辛自不待说，还得冒着被抓捕被杀头的危险。林××、李××二人不知前途如何，心中打起了退堂鼓。到衡阳时，他二人推说钱用完了，不愿往前走了，掉头离开众人转回去了。林芳和几个同伴继续北上，想不到，他们在路上却遭遇了抢劫，身上所带的钱物被抢得一千二净，也只好沿途讨饭还乡。林芳回到鹿寨时，瘦成了皮包骨，身上长满疥疮。他怕父亲阻拦，不敢归家，就悄悄到姑奶家里治疮休养。身体刚复元，他向姑奶要了些钱，又重新上路去延安。一路上，有车乘车，无车步行，他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林芳考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并于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直至 1945 年秋天抗战胜利，林芳一直在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他先后任政治宣传员、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及教育科长等职。后调战士报社任编辑，与《社会主义好》的曲作者李焕之共同创作了《烽火进行曲》。

这首歌当时在延安广为传唱，直到五、六十年代他还时常哼唱。林芳就是当时的笔名，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他还参加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经受了磨练和洗礼。其间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3月，林芳被人诬陷参加“托派”组织。“证据”是他们当年在桂林北上时，得了“托派”的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当时，他们几个小青年根本不知其中原委。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事一时无法辩说清楚，因此，林芳被关进了监狱，戴上脚镣手铐，囚禁了半年。他的两只手腕留下铐出的印痕，直至终生。在审查期间，有一次林芳被押经毛主席住处的窗口，他放声大喊：“毛主席救我！……”这喊声引起了毛主席注意。经甄别审查，林芳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毛主席亲自对被审查的同志说：同志们，组织对大家的审查就象妈妈给孩子洗澡，灰锰氧（即高锰酸钾）放得重一点一样。没有什么的，都过去了，大家都是好同志。林芳和大家一样，听了毛主席这番话，都感到一身轻松，精神倍增。能轻装上阵的林芳，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林芳和一批同志被派往东北执行新的任务。

那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后，占领着东北，等待中国接收。东北，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物产丰富，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国共两党都争着要去接收。我们必须抢在对方之前，接管刚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建立新政府，发展党的各级组织。林芳和战友们急速到达东北后，看到苏联红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当成战利品，大规模地拆下装上一列又一列的火车，运回苏联，他们既觉得心痛，但又很无奈。在接管敌伪财产时，林芳经手处理了大批的金银财宝，有珠宝、银元、金砖、金条、金叶子。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把金叶子藏在鞋子里，可林芳半点也不动心。在东北工作期间，他还担任了党报编辑，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和诗歌，也为战士们写过军歌。

解放战争期间，林芳在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某部任团副政委、团政委。他们的部队来到内蒙境内的通辽地区，开展剿匪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成立农会，开展土地改革等工作。当时为了剿匪，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他带领骑兵连在通辽一带的林海雪原中驰骋，追剿残匪。后来林芳参加了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刚刚结束，部队还未来得及休整，就接到了入关的命令。入关后，林芳参加了平津战役。他们的部队攻打天津时，林泰（即电影《英雄虎胆》中曾泰的原型）就和他在一起。（林泰是东北吉林人，以前因生活所迫上山当了“绿林好汉”——东北人亦称“胡子”。日本人投降后，他们下山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林泰在天津战役中为摸清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况，化装成疯子潜入天津，睡在马棚里，为迷惑敌人吃马粪。就这样，他想去那里敌人也不管他，他顺利的完成了侦察任务。由于睡马棚吃马粪，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以致后来年岁增长后在柳州工作时经常迷迷糊糊的——这些都是题外话。）攻下天津后，林芳把爱人许光安顿在天津住下，即随部队继续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经历了无数的枪林弹雨，总是英勇无畏地冲锋在前。渡江后，部队到了南昌，经过短暂休整，又向广州开进。

解放广州后，林芳所在的部队又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发，陆续解放了八步（今贺州）、玉林、平南、桂平、贵县一带地方。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林芳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广西后，他们的部队在苍梧整训，准备挥师广东雷州，进而解放海南岛。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来自东北和华北。不少连、排干部和战士一来因不适南方水土，二来见全国内陆已经解放，自己家里分了田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都想回家团聚过安稳日子，闹着要复员。在一次800多名连排军官的集训大会上，有几位首长来做思想动员工作，可讲不上几分钟就被下面的人哄得难以下台。这时林芳赶到了，他拿出个火柴盒，用钢笔在盒上写了三点提纲就走上讲台。当时他还不到30岁，中等个子，文文静静的像个书生。下面的一些军官在议论着：看这个小白脸怎么说，不行又把他哄走。

林芳在台上深入浅出的讲了三点，概括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的任务。他说话幽默风趣，入情入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完全改变了先时的气氛。最后林芳挥手问大家：“同志们，我们怎么办？”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振臂高呼：“打过琼州海峡去，解放海南岛！”“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来，林芳同志调离部队，到玉林地委任第一任秘书长、地委委员。

1950年初，广西境内土匪暴乱，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的雒容县（雒容、榴江、中渡三县尚未合并为鹿寨县）地处湘桂铁路、桂柳公路和洛清江水道的交汇处，又是柳州的东北门户，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广西大土匪头之一的林秀山就盘踞在中渡、榴江、雒容、象州、金秀一带，十分猖狂。为加强地方领导，1950年10月，林芳调回家乡，被任命为中共雒容县委第一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因为时任雒容县委书记的是一位北方来的年轻同志，不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南下的干部中，鹿寨籍的干部有中渡的张旺民、鹿寨镇的周一峰、周彤、林芳四人。张旺民属“二野”，要往云贵进发，周一峰到了湖南后就奉调去了苏州，周彤任梧州公安局长，所以雒容县委第一书记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林芳了。林芳是雒容县大龙乡角塘村人，对当地情况熟悉。他到任后，组织和依靠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区、乡人民政权，配合主力部队，很快平息了匪乱。这期间，他正确掌握党在剿匪斗争中的宽严政策，该放的放，该杀的杀。有一次，各区押送了200多人到县里，他严禁打骂，对这些人逐一进行问话调查，详细了解，最后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土匪的亲属和被土匪牵连的人，本身并无血债和犯罪行为，最后都释放了，只处理了少数几个敌对分子。这一来，被释放的那些人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称林芳为“林青天”。这些人为分化瓦解土匪队伍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他们纷纷劝告还在山上为匪的亲人和朋友向政府投降，悔过自新。但是，林芳对那些查实有据的罪大恶极、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的人毫不手软，在他的老家角塘村的大镇屯（即现在的鹿寨镇角塘村大镇屯）主持公审大会，枪决了大镇村的地主恶霸土匪头子林志美。

1951年6月，成立了鹿寨县。林芳于6月上旬调任柳州地委委员、公安处长。这期间，他的工作重点是到中渡、平山的四十八弄指导公安干警、地方民兵配合广西军区的“黄江”部队（广西军区内卫部队）追剿残匪。剿匪斗争结束后，林芳调到南宁任桂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局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桂西壮族自治区撤消，林芳则调任广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在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中，生性耿直的林芳怀着对党的热爱，出于公心，对领导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中提出：应该在党内建立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进行监督的机构。（如今设立的各级党组织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印证了当年林芳的构想是正确的！）他想不到因此在1958年春被划为“右派”，而且是当年广西最大的右派，被开除党籍，调离自治区检察院，工资从11级降到14级，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那几年，他与犯人一同做工，种甘蔗、插秧，不同的是犯人是被强制劳动，他却是自己拼命去劳动。他一心想用汗水来洗刷自己，向党表明心迹。工资降级他不在乎，最令他痛心的是被开除党籍。在蒙冤的日子里，他时常想着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1963年林芳被批准摘掉右派帽子（但不恢复党籍），调到矛桥玻璃厂任厂长。他本是学文科的，对理科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担任厂长后，为了钻研科学技术，他整天置身于生产车间，有时生产上遇到难题，更是废寝忘食，经常在车间里忙到晚上12点多。渐渐地，他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亲自开发了一款非常美观带白色花片的玻璃杯。还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玻璃制品生产工艺技术革新》的文章。在厂里，他依

然像以往一样，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普通职工，都以礼相待，和蔼可亲，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他去世时，所在过的单位好多不管他认不认识的人，都自发地去参加追悼会向他告别。）即使在文革期间，由于他一贯为人好、人缘好，工作刻苦拼命，造反派根本找不出批斗他的理由，只是受到例行的挂牌批判，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在蒙受冤屈的日子里，历经沧桑的林芳对党仍然忠心不改，对工作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和高尚品质。蒙冤 20 载的他，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春天！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芳终获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副检察长职务，后任检察长。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时，不幸病魔袭来，1980 年于南宁病逝。应自治区检察院的要求，鹿寨县“革委会”派韦任良、林润德同志代表家乡人民，到南宁参加林芳同志追悼会。林芳逝世时，年仅 59 岁。



任职于柳州公安处时的林芳

父亲潘文经向张书旂先生学画的经历

●潘允剑

父亲潘文经生前多次对我们讲述向著名画家张书旂先生学画的往事，言谈中总是对恩师出神入化的技艺，充满艺术魅力的作品，提携后辈、不吝赐教的度量充满感激之情。

父亲 1920 年小学毕业以后，在家自学绘画，临摹芥子园画谱及家乡前辈所作的花

鸟条屏。1926年进入广西省立桂林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六年的学习期间，图画科目先后得到桂林市自上海美专学成归来的帅础坚老师和广东省籍岭南画派容大块老师二人的指导，打下了学习中国画的基础。在二师毕业后，父亲出任广西省昭平县师范学校图画老师，但仍惦念如何才能把中国画学得更好的问题，乃于1932年辍教回转桂林，向著名画家唐逸禅先生专门学习花鸟画。摊纸磨墨，调色洗笔，半年的学艺生活，绘画技艺进了一步。一天，父亲在书店看到一本上海出版的《书旂翎毛集》，立即被其花鸟画理论与作品所吸引，认为张书旂先生的艺术风格正合他意。此后父亲便改变流派，孜孜不倦地临摹学习，初步把握了《书旂翎毛集》的艺术风格。

张书旂先生（1900～1957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画家，浙江浦江人，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张先生力求色彩与水墨的融合，作花鸟喜用白粉调和色墨，画面典雅明丽，颇具现代感。因其善用白粉，故有“白粉大家”之称。

1935年春，父亲的作品《雄鹰》参加广西省委托徐悲鸿先生在南宁市举办的广西首届中国画展，获金质奖章一枚。这一荣誉的获得，使他认识到向张书旂先生学习大有奔头，乃致函南京中央大学联系张书旂先生要求函授学习，竟得先生欣然同意。父亲经常寄去作品，先生亦回函指教并寄来学习资料等。张先生并云，可来南京投考中央大学艺术系，若考不上，负责介绍往上海美专读书。1937年父亲有机会去上海读书时，遇上“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事不成行，良机丧失，遂改变初衷，在桂林向广西省政府艺术顾问徐悲鸿先生学习中国画。徐悲鸿先生与张先生是旧交，得知张先生对父亲有过指导，即接受他为学生，传授技艺。

1938年春，父亲的花鸟画参加徐悲鸿先生在柳州市举行的中国画联展，义卖筹款捐献前方抗日。同年秋，入徐先生在桂林创办的艺师学习班学习，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作画水平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听闻徐先生拟聘请书旂先生自渝来桂任教，父亲格外欢喜。由于客观原因，此事未能实现，父亲再度与张先生失之交臂，引为终生憾事。

1941年，张书旂先生以国民外交使者的身份出访美国，并在多国举办画展。在印尼开画展时，邮寄了40张彩色的花鸟画片给父亲，但不幸在途中丢失，随后补寄了8张，父亲收到后如获至宝。举凡张先生在上海所有影印出版的画集画片，父亲都设法购买两套，以防丢失。可惜在“文革”十年浩劫中，珍藏数十年的花鸟画资料尤其是绝版画集、画片被抄家搜去，付之一炬。

1972年，父亲学习书旂先生高超的绘画技巧创作了《梅樱图》，上送广西自治区画展，博得了广泛的好评，证明书旂先生对他的画风产生深刻影响。父亲多次说过：我的成就与张先生的身教言教、艺术示范等等分不开的。他的作品运笔设色均继承有白粉主义大家张书旂先生的韵味，画梅喜古干繁枝，花朵万千，兼重渲染，识者谓作品风格有张书旂的画风。

国共两党父与子

——周公谋与他的儿子们

●黎耘 光明

周公谋，字巨川。榴江县新村（今属鹿寨县）人氏，壮族。生于 1595 年，故于 1970 年，享年 75 岁。

青年时期的周公谋，在桂林中学堂读书时，曾破指血书，宣传演讲，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获硕士学位。

民国 8 年（1919 年），24 岁的周公谋从日本归国，旋即加入国民党。为了抗日，他曾发起组织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宣传抵制日货、抗日救国之道；还曾赴安南（今越南）进行革命活动。“护法运动”（注一）时，任孙中山海陆空大元帅大本营兵工委员，后任东莞县县长。1921 年，26 岁的周公谋受孙中山委派，任桂林县县长及永、古、中、榴清乡督办。同年 11 月，孙中山偕宋庆龄由广州抵达桂林，周公谋率各界人士夹道欢迎，盛极一时。1926 年，31 岁的周公谋到南京，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少将参议。

1938 年 10 月，日寇入侵，占据广州，周公谋赋《闻广州失陷》七绝一首。诗曰：

珠江一夜黑风高，
铁骑胡笳撼怒涛。
锦绣南都今陷落，
书生空哭匣中刀。

1935 年，汪精卫投降日寇，周又作《闻某老同志从贼消息》七绝一首。诗曰：

元祐名先列党碑，（注二）
如何晚菊作秋葵？
披发左衽贼呼父，
知否巢危卵亦危？

在这两首诗中，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周公谋之抗日决心和胆识。

1944 年，日军入侵广西，榴江县沦陷，周公谋出任战时榴江县县长兼民团司令，后因贪污贿赂案被榴江县参议院罢免。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公谋当选广西省参议会议员，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授予国民党元勋证书，并聘任北平土地局局长。1946 年，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

解放前夕，周公谋出走香港。1964 年，他从香港回归大陆，与在沈阳工作的次子周云生活。1969 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外就医。1970 年病故于沈阳。

纵观周公谋之一生，唯国民党是从，是虔虔诚诚的国民党信徒，而他的 5 个儿子，都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周公谋的长子周一峰，1935 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就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积极投入学生之抗日救国运动。1938 年，23 岁的周一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任苏中四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团政委，参加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之后，坚持敌后斗争，担任苏中九分区政委和地委书记。全国解放后，1949 至 1951 年，先后担任中共松江地委副书记、苏州地委和市委书记。1956 年，任江苏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时期，周一峰遭受迫害，蒙冤 10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一峰冤案平反。恢复工作后，先后任江苏省建委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等职，并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与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 年至 1984 年，受党中央委派，周一峰回广西和赴安徽工作，妥善解决“文化大革命”历史遗留问题。1991 年 4 月 30 日在南京逝世，终年 76 岁。

周公谋之次子周云在沈阳工作，亦共产党之忠诚战士。

周公谋之三子周民雷，解放后在广西农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书育人，为共产党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周公谋之四子周民震，1947年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时就组织了由地下党领导的文学社——奔流社，出版刊物《奔向太阳》，担任社长。1948年7月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9月转移到柳北游击总队，进行武装斗争，担任中队政治指导员。解放后参加广西剿匪战斗。1951年3月，周民震奉命带领连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主要从事戏剧和电影剧本创作。1984年担任广西文化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至1998年4月离休。周民震从事文艺创作，著有《周民震电影剧本选》、《周民震戏剧剧本选》、《森林之鹰》、《甜蜜的事业》、《春晖》、《花中之花》、《三朵小红花》、《春雷惊狮》、《寸心篇》、《远方》、广西民族作家丛书《周民震卷》等共十二部。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共19部，其中拍成故事片13部，另6部先后发表。创作戏剧剧本13部，小说散文文论等百余篇。《苗家儿女》是解放后第一部反映广西苗族人民生活的电影。《甜蜜的事业》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反映计划生育的喜剧片。

周公谋之五子周民霖，与其兄周民震解放前均在柳州龙城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解放后，在共青团广西省委任职。之后，先后担任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周公谋的儿子们，走的恰是与之相反的人生道路。

注一：“护法运动”——又称“护法战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孙中山即号召护法。段其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重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同年率驻沪海军到广州，联合“暂行民主”的西南滇、桂军阀，于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抗击北洋军阀段其瑞的军事进攻，曾将进入湖南和四川的北洋军队击败。但滇、桂军阀并非真心拥护孙中山，只为借“护法”扩大地盘。1918年5月，桂系军阀陆荣廷排斥孙中山去职，护法军政府遂为南方军阀政权，向北洋军阀靠拢，酝酿南北议和。（据《中国近代词典》）

注二：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为仆射，后为太师，以恢复新法（即王安石变法）为名，搜刮天下，排斥异己，打击元祐近臣，定司马光、文彦博等120人为“奸党”，并刻名石上。世人称之为“元祐碑”。